

【编者按】

大学文化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引领学校的发展方向。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是大学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主动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和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必然要求。深刻思考大学文化的内涵和本质, 探究其建设的规律, 是当前高校工作者, 特别是高校各级干部所关心的问题。本期《高教参考》选编了有关大学文化建设的资料供大家学习, 以期为推动学校一流农业大学建设提供借鉴。

大学文化与大学的竞争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 柯文进

大学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的独特组织, 在促进社会进步和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大学文化作为群体认同的一种社会规范、一种意识形态, 对大学竞争力产生着日益巨大的影响。大学文化在大学的变革中表现出引领大学变革还是阻碍大学变革的功能, 取决于大学文化的前瞻性和创新性。当前, 如何加快大学的创新和提升竞争力, 已成为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影响一所大学的创新和竞争力的核心是大学文化。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之灵魂, 是推动大学不断前行、不断超越自我的力量之源。因此, 适应当前时代变化, 不断推进大学文化创新, 并引导大学进行有效的改革, 通过大学文化的创新提升大学竞争力, 已成为大学领导者们的责任和使命。

一、大学文化的内涵

大学的产生从一开始就蕴涵着浓重的文化色彩。大学文化是组织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是学校经过其内在系统(管理、教育、教学、科研、生产、经营、生活)活动中的历史积淀与外在环境变化的互动; 是共同创造、继承和不断更新的理念、信念、价值观念、品格、规范、道德准则等意识形态的有机统一。大学文化是一个综合体的概念, 从层次上看可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在教学、科研和管理中逐渐形成的组织意识和文化观念, 是大学文化的一种群体意识。其内容包括大学的办学理念、使命、价值取向、发展战略和培养目标体系。其中办学理念、大学精神是大学的最高宗旨, 如哈佛的“与真理为友”、耶鲁的“光明与真理”、北大的“兼容并包”、清华的“厚德载物”、浙大的“求是”等精神, 都体现出大学的崇高学术追求和崇尚真理的坚定信念, 是大学办学的顶层理念, 它会指导和反映在一所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之中。

大学精神文化主导着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变化和发展, 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大学制度文化是以大学师生的行为为形态的中层组织文化。其主要内容包括大学目标、章程制度、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计划等各种文化活动、组织作风、办事风格等。制度文化以动态的形式存在, 一方面, 不断将人的意识内化, 并影响精神文化的形成; 另一方面, 又不断向物质文化的创造性活动转化, 并最终物化为文化创造物。大学制度文化集中反映出大学的管理文化, 它会鲜明地彰显出大学在体制与机制管理运行中的独特文化, 而大学的发展规划、内外部战略、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办学竞争力则更加显著地代表了大学管理的水平。文化活动是大学制度文化最直接的呈现, 大学师生通过学术交流、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校园文化活动等, 展现大学的校风校貌、校训校格, 是最直观的大学品格。

大学物质文化是指大学文化在物质层次上的体现, 是群体价值观的物质载体, 是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校园校貌、建筑及其风格、纪念日或纪念性标志、校名、校徽、校旗等均是大学文化的物质载体。

由此可见, 大学文化之于大学竞争力是隐性的, 是提升大学竞争力的重要的“软”力量。它是大学的灵魂, 文化育人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大学文化一旦形成主流并渗透到大学的各个层面, 便对大学的形成、发展、变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的学科发展、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特别是在重大领域的科技突破与发现, 显然直接反映出一所大学的真正内涵和竞争力。但大学竞争力同时是大学文化长期孕育和积累的结果, 是一所大学厚积薄发的典型验证, 因此注意通过大学文化的不断创新去提升大学竞争力的意义正在于此。

二、大学文化建设的国际借鉴

综观世界名校,它们大都在发展历程中积淀了自己特有的精神气质和传统,学生和教师在独特的制度设计所创造的教学、科研和服务等良好的环境中孜孜以求,求知识、求真理、求人生的意义。每一所大学的文化表现虽各不相同,但其内核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包含着许多共性。因此,中国大学在转轨时期要建设怎样的大学文化,有必要对国外大学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实践进行学习借鉴。

(一)遵循传统而与时俱进的办学理念

国外几乎所有的大学在办学理念和办学实践上都坚持继承传统与创新相统一,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统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共存。办学理念对一所学校起着定向的作用,是人们对一所学校的定性、定位及职能的认识,即要把这所学校办成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成这样的大学。

哈佛大学建校于1636年,至今依旧欣欣向荣,就是因为其在发展历史中善于适应社会,不断变革创新。哈佛大学1727年设立了教学和自然哲学的教授讲座,在埃利奥特(Charle William Eliot)任校长的40年里(1869—1909年),教育重心由宗教性学科转向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的学科,创立自由选课制,定位于培养个性发展和适应社会需求的“完整学生”。剑桥大学在近800年的历史中形成了特有的高贵气质和传统,保守是它对待新事物的主要方式,但剑桥大学同时也在沿袭古老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在20世纪还兴起了极具全球影响力的“剑桥现象”。不管是美国的哈佛和耶鲁,英国的剑桥和牛津,还是兴起历史较短的东京大学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都主张求学与现实世界的不可分割性。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互动形成的张力促使著名大学在快速发展中依然保持其特色和传统。特别是在到处弥漫科技气息和精神的时代,考察国外著名大学的文化后却“发现世界上一流的大学,例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几乎无一例外地拥有鲜明的人文传统,都有一种精神、一种思想贯穿其整个发展历史。”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共同的洗礼和熏陶是培养“全面的人”的唯一方式。耶鲁大学虽然以人文学科著称,但正是其文理并重的风格才造就了许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剑桥大学不仅培养了伟大的科学家,还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孕育了许多文学家。理工特色鲜明的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一致认为,广泛涉猎多种学科的知识有利于启发灵感,成功不仅需要技巧,更需要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科学思想和创造性思维。

(二)大学自治的制度特征

在制度上,坚持大学自治背景下的开明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学术自由背景下的教学研究制度。从制度文化的角度来看,大学自治是国外著名大学最鲜明的制度特征,也是现代大学的根本制度,并在对内服务方面采取了开明高效的行政管理制度以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同时又用严明的教学管理制度保证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高产出和高质量。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在350年校庆讲话中指出,“正是知识改变了哈佛和其他大学的面貌……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一套组织高等学校的特殊方法。”耶鲁大学采取教授会治校的方式,从制度上保证了行政和教学的一体化。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行政管理制度非常松散,但学术权力却非常活跃、有序。由此可见,大学学术权力自由制度的建立不仅是大学自身的需要,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学术自由制度直接与知识的生产有关,知识生产需要一个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使得不同的知识之间可以自由交流,促进知识的创新和客观化。学术自由制度正是保障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存在的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在国外的大学文化中,学术自由制度已发展成为一种保护思想自由的重要制度。

(三)通识教育:知识与情操并重的全面培养发展模式

20世纪中期以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的知识都进入了学校的课堂,且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知识数量陡然增多,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大学共同基础课的制度,并发展为现在的应用广泛的通识教育制度。通识教育制度最大的好处是在知识和情操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培养,学生同时具备精神层面的思考与社会方面的能力和适应性。哈佛的通识教育是以共同基础课来实现的,课程设置涉及文学和艺术领域、历史学领域、科学领域和外国文化领域。牛津人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人格,而不是人力,是一种通才教育,令人能够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在任何环境下都有价值,使学生过求学求仁的生活,促使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使人人获得机会参与讨论其本国以及世界的共同福利。由此可见,西方大学有着“自由教育”的文化传统,在大学发展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大学教育都将培养自由人作为目标,重视学生的心智训练和个性的和谐发展。培养“人的全面发展”,已成为国外大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四)人格与爱的力量

文化是一个群体的文化,大学的所有者是“教师、学生(包括校友)和管理者”,这些大学文化的承载者们用不同的方式深深地、真挚地爱着自己的学校。校友

们为母校的发展尽最大力量做出贡献,以母校的发展为荣。各地区的人们一般都有强烈的地区自豪感,表现出热爱乡土的精神,每个地区都希望拥有自己最优秀的大学。大学的管理人员,尤其以校长为突出,一般用自己的人格和爱赢得学生和教师的尊重和对其政策的支持,营造学校里互相尊重、携手共同发展的和谐气氛。例如,“美丽的心灵”是普林斯顿大学特有的文化内涵。

(五)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平衡

科学精神、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主导的社会价值观,很多大学也受到了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冲击,教育也开始过分地实用化和工具化。但是,回顾大学发展的历程就不难发现,牛津、剑桥、耶鲁、哈佛等名校经历了多个世纪依然作为世界思想创新之源,帝国理工大学、东京大学等兴起虽只有百余年的大学能够在世界如此多的大学中出类拔萃,关键在于其坚守非功利的文化来应对时代的挑战。因此,无论在什么时代,社会如何变迁,包含着科学、人文、艺术、理想主义、实用主义等多种精神要素的、无序中蕴涵着秩序的文化是育人的最好土壤。现代大学应该要做到在两种方向上的平衡,既保持大学作为追求理想、追求真理、追求知识的象牙塔圣地,又要与现代社会的现实和需求紧密结合,保持大学的时代性。正如鲍罗·舒尔所言,大学的神话是关于现实和愿望的思考,是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混合体。也就是说,“大学不能无象牙塔精神的洛守者,也不能缺乏经世致用之术的专攻者……如果真的完全丧失了象牙塔精神,大学求真、求知精神以及俯视众生的情怀,为尘世的名利、权势所湮没,大学就不过是一个抽离了精神的躯壳而已;当然,如果没有务实的入世求存策略,大学也会丧失自身。这是现代大学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一个择其两端都无出路的两难选择。”

三、大学文化创新的思考

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时期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是推动大学不断改革、不断超越自我、不断提升竞争力的力量之源。因此,无论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还是大学办学的实践者,都应高度关注大学文化的研究和创新。大学文化创新应从以下途径去探索:

第一,创新办学理念。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大学的办学思想、办学定位、办学目标、办学方式的总和,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直接指导其办学行为,影响

大学培育人才和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当前,大学面临的教育环境和国际国内环境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其肩负的使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办学理念也应随之而不断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为大学的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

第二,创新大学精神。大学精神体现了大学的本质特征。大学精神的表现形式包括校训、校风、校歌等,它们是大学精神的语言载体,集中体现了最根本的大学精神。大学精神创新可以通过教育精神和社会文化精神的变化促使大学精神发生变化,使之适应时代的要求。

第三,创新发展战略。发展战略是大学自身发展的目标和战略实施的总体部署。发展战略创新是为了应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重大变化。根据大学的新使命、新观念制定大学发展的新战略是大学文化创新的重要体现。发展战略创新表达了大学的目标和战略实施步骤的创新。实现战略创新既要考虑到大学改革后学校各方面的变化,又要根据学校自身的特点、外部环境的变化趋势重新做出具有特色的新战略,以特色底得竞争是现代大学的必然选择。

第四,创新领导模式。大学领导作为学校发展的领航人,作为学校的灵魂人物,在大学文化创新中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大学改革的逐渐深入、大学规模的逐年壮大、招生数量的递增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学校领导者的各种事务也随之趋于复杂。针对这种情况,大学领导应该在领导方式上增加决策透明度,扩大校内民主,平衡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权利。在领导风格上,要善于综合运用权力因素和非权力因素,营造信任、理解和沟通气氛。还应该塑造良好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和激励全体师生。

第五,创新人力资源管理体制。近几年来,大学教师的自愿流动和被迫流动都呈上升趋势,再加上“以人为本”这一理念的提出,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的创新就显得尤为必要。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的创新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人员调配。通过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的人员外部招聘和内部流动,将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行为带到大学组织中来,从而促成大学文化创新。二是人员培训。人的素质不断开发是大学文化创新的核心内容,尤以教职工的教育培训、师生员工积极性的激发为重点,最大程度地开发和管理人力资源。

第六,注重大学形象的塑造。大学文化常常以组织形象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心目中。组织形象是大学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生动表现,是社会大众对一所学校的总体认识和整体评价。它一经形成,就会在社会

大学文化的内涵发展及建设实践

陕西师范大学校长 房 喻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并不仅是一种物质实体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正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作为创造知识、传播文化、引领风尚的主阵地和辐射源,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先进文化建设方面,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大学文化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育人功能。

一、大学文化内涵发展和时代特征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要培养出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文化的基本功能在于引导人、熏陶人、塑造人、振奋人。《易传》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就是说,当人类从蛮荒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的行为就必须遵守某些规矩,就有了伦理道德的约束;而行为举止和文明习惯的养成,必须通过教化来完成,文化所起的就是这种作用。这就指明了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和“化人”,即以人为本,对人进行教化和熏陶,从而培养出修身、立德、明理的人。可以说,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创造物。大学是文化育人的重要场所。由此,我们理解的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的,经过全体师生员工的长期不懈努力和培育,已经融入到学校的精神传统、办学理念、人文价值以及形象识别系统中,以育人为本质属性的高级文化形态。

历史上人们对大学使命的认识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从纽曼的知识传授,到洪堡的科学研究,再到威斯康辛的社会服务,以至于发展到21世纪的着眼未来、引领社会。随着人们对大学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大学文化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尽管,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大学文化的时代特征,但我们认为,以下四点是最基本的或不可缺少的。

一是大学文化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文化。大学代表

公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起作用。所以,大学要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注重自身形象的塑造。

综上所述,大学文化创新是现代大学核心竞争力

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论思维 and 知识创新的最高水平。创造知识的过程,就是不断提出新知识、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的过程,也就是探求科学真理的过程。大学文化应当培养这种敢于追求真理并为真理献身的勇气、毅力和决心。

二是大学文化是一种崇尚学术的文化。大学拒绝一切落后思想观念和教条的禁锢和束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始终强调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要求在自由的氛围中进行学术的理性思考和研究。大学文化绝不能追逐实用功利,要保持独立的学术尊严和独特的学术品格。

三是大学文化是一种严谨求实的文化。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人们常用“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来赞赏那种甘坐冷板凳、一心做学问的治学精神。大学文化重视严谨、逻辑、实证、经验,坚持实事求是、崇真务实,能够脚踏实地、坚忍不拔,要求持续不断地艰苦攀登和勤奋工作,实现科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四是大学文化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开放包容精神是大学精神的基本要素,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精神使大学不断获取和更新推动大学发展的动力。开放精神要求保持民族特色,坚持和而不同,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大学精神的精髓与中国大学的历史使命、时代精神有机地融合,兼容并包,和谐开放。所以,大学应该成为继承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场所和吸收借鉴世界进步文化的窗口,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我们今天再来认识大学文化建设,它的意义和作用起码可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学文化是大学软实力的体现。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了“软实力”概念,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

的坚实的精神基础。通过大学文化创新,可以使大学适应高校改革的教育环境和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并且在大学自身的改革中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来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9年02期

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硬实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而软实力则是看不见的精神力量。对于一个大学而言,如果说基础设施、师资队伍、图书仪器、经费拨款等代表了硬实力的话,那么,大学文化就代表了一个大学的软实力。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和升华。大学文化彰显了一所大学不同于其他大学的本质特征和内在精神。

二是大学文化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是在学校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最具优势、最具特色、最具冲击力的竞争力。我们的理解,大学的核心竞争力等于“优势学科+一流学者+大学文化”,即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以优势学科为标志、以一流学者为支撑、以大学文化为灵魂,是三位一体的。大学文化,是提高大学核心竞争力的三驾马车之一。抓好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是不断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核心竞争力强调的是软件重于硬件、质量重于数量,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同时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目的和结果。

三是大学文化是大学师生共有精神家园的体现。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化。各大学的历史、学科特色以及知名学者的品格、气质和创造力共同孕育了自己的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资源和无形的资产,也是一所学校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文化传统,也就构成了大学师生共有的精神家园。大学文化既是大学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总结,又是未来大学发展的精神基础,它总是在发展中创造,在创造中发展,与时俱进,永无止境。大学文化的建设,就是在营造师生共有的精神家园。

二、大学文化建设实践

高水平大学应当具备四个要素:即完善的基础设施、优良的仪器设备、丰富的图书资料等有形资产;一流的师资、优秀的学生、高水平的管理者等人力资源;品位高雅、氛围浓郁、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民主管理、教育家办学的科学体制。陕西师大作为西北地区唯一一所教育部直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师范大学,学校的奋斗目标是努力建设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在我看来,研究型大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水平大学。在这一进程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必须始终坚持和培育崇真务实、开放包容、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必须把大学文化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来认识、谋划和实施。

1. 凝练和弘扬特色鲜明的师大精神

大学是需要一种精神的,高水平大学更多的应该反映在一种精神上、一种气质上。这种精神和气质只能感受到、感觉到,难以量化、难以言表,而且,只能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积淀才可以养成。具体来讲,高水平大学的精神气质、优良校风、大校风范,更多的是反映在学校有没有浓郁的高品位的校园文化;有没有比较多的富有个性、具有独立思考精神、敢于承担责任的高水平教授;在学校内,教授在办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尊重;学生在就学期间是否有远大志向;办学特色是否突出,等等。只要是浸润在这种大学精神和文化氛围中的人,都会受到感染和熏陶。只要是从这种大学走出来的学生,都会带有强烈的大学精神的印记。有人将之比拟为“泡菜坛子的水”,就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在近65年的办学历程中,陕西师大逐渐形成了厚重、独有的师大精神。这种精神包含着三重内容:一是校训,二是办学理念,三是教风学风校风。“厚德、积学、励志、敦行”的校训,在建设和弘扬高品位校园文化,增强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通过两次全校规模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大讨论,更新了观念,统一了思想,确立了崇真务实、开放包容、追求卓越办学理念;形成了严谨治学、求是创新、“厚德敦行”的学风和校风。

大校风范是对教风、学风和校风的抽象概括和理论升华,体现了大学文化的境界追求。因为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工作不仅需要管理、需要制度,更需要一种氛围。因此,解放思想、努力工作,悉心营造文理交融、宽松和谐、勇于创新、敢为人先、追求真理、宽容失败、鼓励竞争、崇尚合作、淡泊名利的学术氛围和创新文化就显得特别重要。在服务社会和批判现实、适应时代和瞻望未来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保持理性的认知和反思的态度,绝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以这样的大学精神和大校风范去育人,才能够培养出社会的栋梁之才。

2. 在办学实践中全方位彰显师大精神

陕西师大的文化建设重视全员、全程、全面,注重在办学过程的教学、科研、管理等诸环节全方位地展示师大精神,营造有利的育人环境,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对师生进行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影响。

大学文化实践彰显了师大精神的开放性。我们制订了《陕西师范大学2006—2010年教师教育行动计划》,不断更新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积极创新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并实施了独具特色的“2+2”本

科人才培养模式和“4+2”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着力构建本科和研究生两个层次协调发展、职前职后教育一体化、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并举、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终身学习的多样化、多层次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学校实行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建立起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动态激励的奖助学体系,并且在全校范围内推行研究生课程的共建共享,本科生也可以选修部分研究生课程,还要求独立设置的专门科研机构必须为本科生提供公选课程;我们还大力实现在全校范围内资源的科学配置与共享公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与效益,基于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大型仪器设备的实时监控系統已经基本建成;在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学校制定了《教师出国研修实施办法》,计划每年选派40人左右,到2019年,力争使学校具有3个月以上出国留学经历的教师比例达到20%。

大学文化实践彰显了师大精神的包容性。学校引进和吸引了大批高层次、高水平师资和团队,很多人具有长期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经历,改善了师资队伍的结构,他们中有多位被委以重任;在职称评定上,我们既严格按量化标准打分,又建立了多元化的评价体系,用教师的已有成果衡量其学术水准,用长期的工作态度确定其献身教学科研的精神,用对未来工作的设想判断其是否具有深远的学术追求,在刚刚结束的教师岗位聘任中,年资不够但成果特别突出的教师,可以破格申报,走绿色通道,有利于年轻拔尖人才的成长;我们对于学生,不以考试成绩为唯一评价尺度,而是突出个性化发展,我们正在尝试,对那些积极向上、品学兼优,在学业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其毕业证颁发和学位授予,可采取更为灵活与包容的方式。

大学文化实践彰显了师大精神的务实性。文化作为精神层面的东西,只有立足于物质基础上,才能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学校2008年建成了14(X)套教师住宅,这在学校历史、甚至在陕西高校历史上,都是不曾有的。在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对校医院进行了翻新改造,添里了新的医疗设备;新建成的离退休教工活动中心,已成为老年教职工健身、娱乐、休闲的好去处,等等诸多方面。这一切无不体现着文化的人本主义思想和人文关怀的巨大魅力。

3. 充分发挥校因文化的育人功能

以高频度、多形式的学术活动丰富校园学术文化。例如:学校新闻网上开办了管理者说、三人行、知名教授访谈等栏目;图书馆开办了专家导引室、文化沙龙、

网上报告厅;学校不同单位主办了教师教育论坛、长安大讲堂、曲江讲坛等。除全国高校十大名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外,我们又创办了《当代教师教育》、《社会科学评论》、《中国艺术教育》等人文社科杂志,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以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提升校园的文化品位。学校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出发,充分发挥艺术专业师资与学科资源优势,依托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积极推进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帮助学生提高艺术修养。

以培养学生的自组织能力发挥社团的育人功能。如学生社团中有马列理论读书社、挑战科技协会、红烛艺术团等;开通了具有互动功能的“西岳论坛”、“师大路论坛”、“积学论坛”等网络交流平台。大力开展了课外八学分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三下乡”实践活动、研究生支教活动、社区志愿者服务活动等,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的内涵,发挥了社团活动的文化育人功能。

以不断加大的经费投入建设校园文化的载体和硬件设施。如,学校的楼宇命名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如积学堂、六艺楼、格物楼、文津楼、文渊楼、终南音乐厅等;学校新建的“陕西师范大学博物馆”,已是各级领导、来宾到校参观的必去之地。下一步我们还要加紧筹建自然博物馆。长期以来,在陕西高校中,有着“美在师大”的说法。我们已经建立了学校的形象识别系统,注重展示校训、校歌、校旗、校徽、建筑物等文化内涵,努力加强师生的认同感,增强环境文化的育人功能。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09年07期

用大学文化推动大学发展改革

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 杨德广

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文化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文化。从文化本身的内涵探究,文化与教育密切关联。教育的本质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和大学教育发展的产物。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时期,如何保持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从规模发展向质量发展的转变,必须靠改革来实现发展,而真正推动改革向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原动力是研究和大学文化,加强大学文化建设。

一、研究和大学文化要以先进文化为指导,克服和转变旧的教育理念

何谓文化?简而言之,文化是指人类在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积淀而成的人文、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价值追求等。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综合反映,直接影响着教育活动。文化对教育起指导和引导作用,教育对文化起传承和推动的作用。

大学教育是教育的最高阶段。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以大学为载体的大学文化既受制于社会文化又受制于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所大学的文化是一所大学长期以来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在广大师生共同努力下,创造、传承和积累而成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也是这所学校最最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大学是知识分子、高层次、高水平人才集中的地方,是传承、研究、探索学问之地,是培养和造就高级专门人才的地方。大学文化应该是崇尚学术、追求真理、严谨求是的文化,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文化,是弘扬高雅的、先进文化的制高点,是“以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文化,是批判与创新的文化。

研究大学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大学文化,更是为了建立先进的文化,抵制庸俗、落后、腐朽的文化,推动大学积极健康发展;研究中国大学文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研究大学文化要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帮助广大师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研究大学文化要积极推动和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向开放,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期,有不少传统的陈旧观念阻碍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因此必须用先进文化为指导,克服和转变旧的教育理念。

研究大学文化要理论联系实际,要紧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用以指导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充分发挥大学文化的竞争力、凝聚力和生命力。大学文化的内涵很广,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等。其中精神文化是核心,物质文化是基础,制度文化是保障,环境文化是形象。

二、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在育人,引导和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努力成才

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灵魂和核心,是大学建设和发展的推动力。大学精神文化建设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树立正确的办学理念、办学方向、培养目标,包括各类学校的正确定位,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对师生加强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思想道德、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三是加强人文素养教育,要大力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包括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民为本、家国同构的精神,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精神,教亲敬长、厚德载物的精神等。大学精神文化深深地体现在大学的使命和校风、校训方面,反映了大学的信念和追求目标,并激励广大师生沿着这一信念和目标前进。如哈佛大学的“与真理为友”,斯坦福大学的“让自由之风吹拂”,西南联大的“刚毅坚卓”,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山东大学的“气有浩然,学无止境”,台湾淡江大学的“贵在做人”等,这些反映了大学文化精神,也是这些学校长期以来在大学精神文化建设上的成果。大学精神文化不是虚构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体现在大学育人当中的。我担任过多年的大学校长,对如何把大学精神文化运用到办学育人中有着比较深切的体会。上世纪90年代,我任上海师大校

长,针对学生中存在的学习热情不高,学习动力不足,平时比较散、松和懒等现象,狠抓学校的精神文化建设,在学生中开展了“充实教育”和“文明修身”活动,即充实学生的教学内容,充实学生的课余活动,充实学生的精神生活,让学生“忙”起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动积极性、成才积极性。通过“充实教育”、“文明修身”教育以及社会实践活动,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学习热情、成才积极性提高了。

三、大学文化的本质是坚持创新,加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大学文化一方面体现在办学理念、办学方向、意识形态上,一方面体现在学校的物质建设上。中国古代文化堪称世界一流,不仅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文化,以及文学、音乐、舞蹈等精神文化,而且包括“四大发明”、长城、故宫等物质文化。大学物质文化建设,应体现在校园建设、学科建设、教学科研设备建设、教师住房建设等方面。一个破旧脏乱的校园,陈旧落后的设备,拥挤不堪的住房,不可能去发展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重视物质文化建设,就是稳定教师队伍,提供良好办学条件,就能确保教育质量提高的必要措施。在精神文化指导下推动物质文化建设,而物质文化发展了反过来促进精神文化建设,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地方高等教育,长期以来教育经费不足,导致一些地方高校校舍年久失修,设备陈旧落后,教学及实验室用房不够,教师住房十分困难。这样恶劣的物质条件怎能稳定人心,怎能发展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大学的精神文化应体现于全心全意为师生员工服务,努力创造良好的物质文化。近年来,高校大抓基本建设,住房建设,改变“等、靠、要”的思维模式,通过集资、贷款、发展教育产业,政府拨款等多种途径,各校在新校区建设、新教学实验大楼建设、新学生生活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高等教育扩招后的质量保障奠定了基础。

从系统论的观念看,任何一个动态的系统,都有大系统和小系统,反映大系统与小系统之间分工协作、权力分配等关系的总和,称之为体制。而维系大系统与小系统之间,以及大系统之间、小系统之间的正常运行的规则、原理、原则、规范、规定等称之为制度。大学制度文化,是维系大学内部运行、以及维系大学与外部关系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条例、规定、管理制度等。如教学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校园管理制度、招生制度、教师守则、学生守则、岗位责任制

度、作息制度等。制度文化是大学文化建设的保障,制度文化要建立在全校师生员工共同的办学理念上,要依靠广大师生员工共同制订,共同维护和执行。更重要的是,要把学校的规章制度内化为师生员工自觉的行为规范和习惯。每个人做每件事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每一个“游戏”都有规则遵循。规章制度不同于靠舆论来维系的道德规范,它带有强制性,具有一定权威性和法律性效应。也就是说,人人必须遵守,否则将给予必要的处罚。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应把制度文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并用制度文化保障大学的发展,促进大学的发展。在这方面,校长的责任重大。校长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管理条例。有了制度,大学制度,还是一条发扬民主、及时地处理各种行政和学术争端的渠道,并对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起到了导向作用和制约作用。

发展文化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推动社会的发展。要发展必须创新,不能止步不前。因此,创新是文化的生命力,也是社会进步的生命力。大学文化发展除了要努力“坚守”育人为本,必须不断创新,创新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本质,创新精神是大学精神文化的体现,是推动大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要大力发展大学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并推动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坚持创新。我国的教育长期以来受传统的封建思想和计划经济思想影响很深,尤其是计划经济下“统、包、管”“等、靠、要”等观念,“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体制,阻碍了教育的发展。坚持创新,就要更新传统的陈旧观念,克服“等靠要”的观念。

大学校长是大学文化的带头人,传播者和实践者,大学校长必须有创新精神。在国家教育经费比较短缺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上大学的需求,不能完全依赖国家投资。作为地方大学校长,“要找市长,更要找市场”,“等米下锅”不如“找米下锅”。大学文化的本质是创新,大学不发展没有钱,只有发展了,钱才会来;大学不发展,学生不会来,发展了,校园建好了,就会吸引学生来。大学要为培养人才服务,要为国家分忧解难。只要我们更新观念,大胆探索,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地方大学中的办学水平、办学质量不断提高,也涌现出一批国内知名的、办学特色越来越明显的高校,这些学校的办学充分体现了更新观念,勇于创新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用大学精神文化指导大学建设的显著效果。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

大学文化应是“育人为本”的文化

天津大学校长 龚克

大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以“育人为本”的机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对人才素质要求的不断变化,大学的组织形式、发展方式、办学模式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学的功能因为不同时代的要求而有所拓展,但是不论时代如何变迁、大学如何发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大学办学的根本问题。然而,人类世界是发展变化的,教育因而也是发展变化的。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教育必然要为这个时代对人才的要求服务,于是“现代教育”出现了;信息革命发生了,生态或后工业文明即将到来,教育如何自觉适应这个变化呢?这就要求大学在“不变”之中自觉求“变”。所不变者,大学文化之根本也;所变者,大学发展之脉络也。大学应该以培养人才为根本,坚持教育本质、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模式,提升教育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大学文化之“坚持”与“创新”的统一。

一、大学文化之根本是“育人为本”

第一,大学文化作为特定的组织文化,应该与组织的根本任务紧密联系。文化是什么?毛泽东同志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我们所说的大学文化,实际上是在谈特定的组织文化。大学、企业、军队、社团等等组织,它们在社会体系中肩负着不同的使命、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其文化必定与其自身承担的根本任务紧密联系。现在论述大学文化的文章不少,有的语言很犀利、有的谈古论今、有的说洋道土,讲学术自由、讲治理结构、讲学科建设……观点都很有道理,但读来多有隔靴搔痒之感。为什么?因为许多“大学文化”之论并不联系大学的根本任务,不少文章大多是将“人才培养”仅仅作为大学众多的功能之一、还有不少的文章根本不谈“学生发展”,这样的趋势不禁使人产生当下大学文化的走偏之感。

善,迫切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这就为学校发展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国家教育经费有限,而且要向重点院校倾斜,不可能加大对这类一般院校的投入。于是必须改变计划经济下“等靠要”观念,走改革创新的道路,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政策,走多元化集资

第二,大学文化本质上应是“育人”文化。大学的具体行为(功能)是多方面的。教学,是大学至为重要的工作,但是大学为什么要教学?科研,也是大学至为重要的工作,但是大学为什么要科研?国际交流合作亦是大学至为重要的工作,但是大学为什么要国际交流?发展师资,更是重中之重,但是大学为什么要发展师资?还有安全、卫生、财务等等,都是重要的工作,但是大学为什么要抓这些?追根寻底,社会为什么需要大学,大学的根本任务究竟是什么?大学是培养人才的专业组织,其根本任务必然是“育人”,而且也只能是“育人”。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史,大学的功能虽然在不断拓展,但是其“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或核心功能始终没有变。大学是因为其培养人才的基本社会功能而存在的,大学可能承担许多其他社会功能,譬如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引领文化等等,但是大学决不是因为这些社会功能的需求而存在,这些功能都是其核心功能——人才培养的延伸。国外通常所讲的大学功能是“Teaching, Research, Service”,三者都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现在把“Teaching”翻译成“人才培养”是很不妥当的。

第三,“育人为本”是教育的本质要求,也是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明确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是要自觉地把培养人作为根本目的。高等教育坚持以育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内在要求。虽然我们党的教育方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过不同的表述,但是始终坚持以培养人为根本目的,始终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做出的表述是:“坚持育人为

的渠道,为满足人民群众上大学的需求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条路所以能走得比较顺利,重要的是以大学文化为指导,坚持走开放创新之路。这是大学发展的生命力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01期

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的大学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务,大学的一切工作都应该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大学文化必须坚持其亘古不变的教育本质,这样才能区别于企业的文化、军队的文化、社团的文化以及其他组织的文化,而成其为“大学文化”。

二、大学文化要坚守“育人为本”

为什么要提“坚守”?这是因为当下的大学文化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育人之本,确实存在着一些“误区”。

第一,“研究高深学问者”所为者,育人也。现在谈大学文化,大都要引用蔡元培先生的话,感慨“中国再无蔡先生”者也不乏其人。蔡先生的话被引用最为频繁之一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然而,蔡先生何出此言?究之者甚少。查蔡先生原著,应知先生所论者乃育人也。1917年1月9日,蔡先生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明明白白地提出“请以三事为诸君告: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显然讲的都是育人。其中谈及“大学者,深究高深学问者也。”乃是在批评当时的北大学生多有抱读书做官的不端思想。他说“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90多年过去了,先生之言竟仍能切中时弊,嗟乎!何以如此?育人立志之文化缺失了。

第二,延揽“大师”所为者,育人也。现在谈如何办好大学,几乎都要引用梅贻琦先生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此,大学的各级领导们都强调“人才引进”工作的极为重要性。但是,引进人才是为了什么呢?回答大都为:为了学科建设。其实也是为了各种评估、为了更好地获得各种资源、……,即使提到“人才培养”,也往往置于“N分之一”的地位。试问梅先生当年何以出此言?看看他1931年12月3日到清华大学任校长当天,在全校大会上发表的就职演说的全文,就不难发现梅先生的原意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

材。……。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 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在演讲最后他还进一步明确了办大学的目的:“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通读梅先生演讲全文,对他的办学理念管中窥豹式的理解自然不攻自破。清华的成就,与梅先生的办学理念密不可分,核心就是“育人”。

第三,“洪堡思想”,育人之说也。现在论大学文化者几乎言必称洪堡,强调科学研究和学术自由。殊不知,洪堡当年并不是就学术论学术,他乃是围绕培养学生而提出其办学理念的。洪堡认为,只有将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才能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方式以及高尚的品格。洪堡所说的学术自由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学习自由”和“教学自由”。而学习自由在当今我国的大学里是少之又少的,学生的自主发展受到极大的局限。近闻不少学校为培养“拔尖”人才,将优秀学生集中起来强化培养,我怕如此一来又进一步减少了学生的学习自由,窃未闻世上拔尖之人才是如此培养出来的。

第四,“功利化”侵蚀大学文化,害在办学失本。功利化的办学思路和对大学文化本质偏颇的理解,使当下我国的大学文化有非常严重的舍本逐末的倾向。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这本是早已明确、反复申明的方针。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不是这样,现实中我国大学的中心往往不是学生而是学科。学科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在于学科水平是大学的教学质量、科研实力、师资水平和装备条件等在一定学术领域的集成和综合表现。发展学科要为培养学生服务的,但是,这个根本的宗旨往往被学科的排名以及导致排名的评估,特别是排名后的资源分配所淹没了。这就是当前大学的校长和教师们忙得不亦乐乎,而学生和民众对大学不甚满意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文化已经被严重扭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审视当下,有多少大学的领导干部能拿出较为充分的时间倾听学生的需求和想法?大学里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会议又有多少在深入研究“学生成长”?有多少大学教师尤其是研究生导师在为自己学生的发展殚精竭虑,而不是让学生帮助自己的发展?

第五,大学务“育人”之本方能兴“办学”之业。

钱学森先生晚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想，钱老所指的“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大学并没有真正以“育人”为本。或者说在大学里“育人文本”并没有成为“文化”的核心，学生的成长成才并没有成为学校的核心价值所在。我们现在应该真正发展以育人为本的大学文化，深植大学文化的育人之根。务本才能兴业，不务本的教育永远不会是高质量的教育，不务本的大学永远不会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三、大学文化应有“教科融合”之特色

第一，高水平的“育人”需要大学全部的工作作为支撑，其中最重要的是教学和科研。教学和科研是大学“育人”的第一线，各方面的工作都要服务第一线，服务于育人，这不仅是大学的工作部署，更是大学的文化要求。尊重教学、尊重科研，进而尊重教师，既是大学文化使然，亦是大学文化内涵。“教学”是做好育人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不是全部。现在很多人将“教学”等同于“人才培养”，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观点。我们这里所说的大学文化回归“育人”的本质当然意味着要重视教学，但绝不是只要做好了教学工作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说大学的所有工作都应该以“育人”为中心，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服务。大学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同样也是为“培养人才”这个中心服务的，而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教学工作具有基础性应予以优先地位。这不该是行政命令或者“文件要求”，而应该是“文化要求”。大学的文化可以体现在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而最直接体现大学“育人”文化的工作就是“教学”。教学工作特别是本科教学工作应当放在什么位置呢？我的回答是，由于本科教学对学校来说具有根本的和基础的性质，因而必须放在“优先”的位置。现在我国的很多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存在严重的片面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的现象，或者口头上说两者“并重”而实际上把教学放在次要的地位，这恰恰正是我们当前要克服的错误倾向。它之所以错误，乃是在于它忽视了知识积累和传承的规律，忽视教学这一历久而不衰的知识传承手段对于人才培养的基础性作用，最终造成对于“人才培养”这个根本任务的偏离而导致大

学的迷失。大学就是大学，不是企业，也不是单纯的科研机构。大学必须以教学为基础承担起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在大学里，教学既要与科研紧密结合，又必须放在第一位。既然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既然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既然在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大学培养模式中教学是第一位的，那么，将教学工作定位于“优先”的位置就是理之必然、理所当然！

第三，科研工作是培育创新人才不可或缺的载体。人才培养仅仅靠教学是不够的，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更是不够的。把“Teaching, Research, Service”译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不妥之处不仅在于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并列，而且还在于误将“人才培养”等于“教学”。大学的科学研究是育人的重要平台，重大的科技项目是培养和造就一流人才的有效平台。美国著名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大项目造就了无数高端科技人才。在新中国科技史上，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人感佩的优秀科技精英。他们的卓越成就不仅来自于个人的优良禀赋，更来自于国家重大科技工程的历练。目前，我国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科学大师和领军人物不足，难以把握重大的发展方向，做出具有世界水平的重大贡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众多具有优秀潜质的人才缺乏参与重大科技项目的实践，缺乏与国际一流科学家合作的机会。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大项目的意义不仅在于出大成果，更重要的是能够出大人才。只有为各类优秀人才提供发挥聪明才智的舞台，才能锻造出更多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优秀科技人才，才能培养出众多属于中国的一流科学技术大师。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大学，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国家培养又好又多的高层次优秀人才，而这些人才的培养就要靠大型科研项目来支撑。中国的科教体制不同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不应该因此就拒绝接纳发达国家“教科结合”的成功经验。

第四，“教科融合”是“大学文化”的应有特色。必须承认教学与科研虽然都很重要，却往往相互矛盾。优秀的大学总是在破解两者矛盾上走在前面，其中固然有“领导”的力量、“制度”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因为两者的结合点在“人”，在“师”，在“生”。教科融合的文化建设是大学重要的“软实力”所在。改革开放，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最为重要的推动之一，在于大学科研的兴起，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之一。当年他明确地指出：“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

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可惜的是,从整个体制上看,小平同志的指示尚未完全贯彻;从学校内部看,存在着“两个中心”的误解,即把小平同志所讲的“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当作了“两个”中心。依愚之见,“既是……又是”不是讲两件事,而是讲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所以,我认为,小平同志讲的是大学不仅要教学而且要科研,两者要结合起来。教科结合是大学的特色,也是大学文化应有的特色。

四、大学文化是“坚守”与“更新”相结合的文化

大学文化作为“育人为本”的文化,其核心乃是育人观,即以“培养什么人”为第一位的文化。现时谈改革,多在论“如何培养人”,好像“培养什么人”已经不是问题。其实不然,我以为关键仍在于真正地、具体地弄清“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一是要“坚守”,二是要“更新”。

第一,“坚守”什么?

在坚守育人为本的基础上,最重要的是坚守“以德为先”的育人观念和“全面发展”的育人方向。“以德为先”既是“育人”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虽然现代大学可以算是舶来品,但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充分吸收中华民族教育的精华才能够形成“中国的”大学文化。中国教育历来重视德育。司马光直接论述了德才关系:“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们的教育至少也应该努力培养“君子”,做到“德高”,所以要以德为先、立德树人。要树立新时期的全面德育观,要把“德育”从某种“专业化”形态的知识教育中升华出来,融入到教育的方方面面和全部过程。特别提一下“学德”或者“科技道德”的问题,在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科技伦理道德和学术规范应是当今大学“德育”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在育人为本、以德为先的基础上,要坚持“全面发展”的方向。“全面发展”也是“育人”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育人观的核心所在。马克思理想中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可以说,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是古今中外先进教育思想的精华。前辈先贤们一直强调“为人”重于“为学”,“为人”要“全面发展”。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杜威认为:“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组织保证继续生长的各种力量,以保证教育得以继续进

行,使人们乐于从生活本身学习,并乐于把生活条件造成一种境界,使人人在生活过程中学习,这就是学校教育的最好的产物。”陶行知先生更是强调要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眼睛、嘴巴、空间和时间”,以使他们能想、能干、能看、能谈、不受任何禁锢的学习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则进一步指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之一。而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明确表述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总之,“以德为先”、“全面发展”是大学文化在任何发展阶段都应该理所当然坚持的内涵和发展方向。

第二,“更新”什么?

要更新的东西实在很多。我认为,关键是“更新教育观念”,重点是将“知识为本”的教育观念更新为“素质为本”。传统的教育主要通过传授知识来培养人才,这种教育方式基本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模式,并培养出了大批人才。知识传授型的教育方式将知识归纳总结成许多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学生们的任务是通过教师的引导和讲解学会这些知识并消化吸收。今天,知识传授依然是教育的重要职能,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教育方式已经逐渐显现出它的弊端。首先是新的科技革命以来,知识的数量出现爆炸式的增长,早已远远突破了课堂可承载的容量;再者是知识更新的速度空前加快,今天的“真理”很快就会被新的认识所取代,这使得传统的教学受到根本性的挑战;还有,新知识不断地在交叉边缘领域突破,不同学科(专业)的交融生长,更是冲破了传统的知识体系(与之相关的是教学体系、课程体系等)。如果说以上这些变化和趋势,启示人们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育学习知识、更新知识的能力;那么,当代和未来对于知识的大规模应用,以及全球化使得知识应用的影响更具全球性的情况就要求教育在传授知识、培育能力的同时,特别重视受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感、人文精神、可持续发展意识和身心健康的培育。只有具有全面发展素质的人才能正确地、负责任地应用知识和创造新的知识,从而造福于人类社会的良性持续发展。总而言之,从“知识为本”转向“素质为本”是历史的要求、是教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的进步。大学文化要顺应和推进这个转变而不是阻滞这个转变,大学文化应该成为“素质教育”发展的文化力量。

搞好素质教育,我们应该跳出误区、突破障碍。

所谓“误区”,就是把“素质”作为知识、能力的

大学文化的本质是求真育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顾明远

关于大学文化这几年议论得很多,但什么是大学文化,为什么要建设大学文化,怎样建设大学文化则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我也来说说一家之言。

我觉得,文化这个概念是很普遍的,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文化。当然有先进的文化和落后的文化,高雅的文化和庸俗的文化之分。大学文化应该从大学里的一群人来分析。大学里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是干什么的?也就是大学的本质是什么?大学文化要从大学的本质中来挖掘。大学的本质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新价值观和培育人才。我们常常说,大学的职能是教学、科研和服务。但其最本质的东西是求真育人。研究学术、创造知识都是求真,是认识世界,追求真理,然后创造新的知识、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培育人才无需解释,大家都理解。但是大学的育人与其他社会机构的育人不同,它是在求真中育人。凡是科研机构都要研究学术,当然在开展科研过程中也培养年轻人,但那是其的衍生物,不是主要的任务。中小学幼儿园都是育人的机构,但是其主要是传授现存的知识,没有科研的任务。只有大学又要

补充。司空见惯的提法是“知识、能力、素质”。我以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知识、能力等等应该是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难道知识贫乏、能力羸弱的人可以是高素质人才吗?答案是明显的。什么是素质教育?我以为,邓小平同志说的教育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就是一种很好的表述。这里的关键在于,素质教育不是“知识传授”的补充或扩充,而是升华和发展。这是一种新的教育观,也是教育文化发展的新境界。面对新时期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知识的快速更新以及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使人们在社会中会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和问题,从教育的角度而言,素质教育是一剂“治本”的良药,因为它能够真正做到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所谓“障碍”可以讲许多,但关键的是评价体系。传统的教育方式,教师们按照课程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教学大纲中的核心问题就形成了一个知识点。而考察学生对知识掌握情况的主要方式是考试,对于学生的评价基本是靠考试的分数考察其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而分数往往又是学生们评奖学金、争取保送

开展科研,又要培养人才,而且要用科研成果来培养人才。所以说求真育人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本质特征。大学文化要建立在这个本质特征之上。

从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来讲,教育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具有传承文化、选择文化和创造文化的功能。教育在传承文化过程中不是原封不动地把原有的文化传承下去,而总是有所选择的。历史上汉代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一次文化选择;宋明理学吸收佛教的思想,又是一次文化选择和文化创造。西学东渐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经过拒绝接受、被迫接受和自觉接受的过程,其中也有文化的选择。大学教授们在传授学问的时候,无论是对经典的诠释,还是对新生事物的创新发展,总是在前人经验基础上的传承、选择和创造。由于大学具有传承文化、选择文化、创新文化的功能,所以其有引领社会先进文化的责任。

求真是大学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人们常讲,大学要有大师,正如梅贻琦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什么样的教师能称

研究生资格等最重要的砝码。可是评定分数依据的又是什么呢?做教师的都知道,考试的试题就是覆盖那些知识点的问题,所以,考试“分数”高的学生就是对这些知识点掌握得好的人。这样的模式导致学生们最为关注的就是将要被考试的内容,对课程的其他内容以及相关兴趣不大;而教师们则以熟悉教材内容为己任,对课程知识的前沿问题、相关问题、全局问题等等就不甚关心。可见,如此评价体系不仅误导了学生也误导了教师。因此,我们必须改变目前这种片面的教育质量观,建立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新的质量观。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老师和学生都会不大适应;这是当前推动素质教育的最大困难,是需要付出代价去求索的。这里,不仅需要领导的决心,需要配套的措施,特别需要文化的力量。

优秀的大学文化是引导大学发展的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优秀的大学文化对于育人的作用远远超过具体的课程、实验和活动,向素质教育转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大学文化的前进方向。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01期

得上大师?恐怕除了有渊博的知识外,还要有一种引领学界的精神。大师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是求真。2009年去世的季羨林先生、任继愈先生、钱学森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大师的具体形象,他们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求真,一辈子不论遇到什么风吹浪打,都坚持追求真理不动摇。我们现在的大学就是缺少这样的大师。特别是近些年来,大学浮躁,为了排名,为了获奖,不惜粗制滥造,抄袭之风盛行,甚至有的大学校长都抄袭文章。这真是斯文扫地,有失大学体统。大学的失真当前大学文化的腐蚀剂。因此,要建设大学文化,就要还大学求真的本真。

大学的教师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带领青年学子开展科研、创造知识,还要以个人的睿智、人格魅力培育和影响人才,引领学界追求真理。因此,大学的文化建设重在教师的学风建设和人格建设上。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不仅适用于北京师范大学,也适用于其他大学对教师的要求。坚持优良的学风,反对学术腐败,已经不只是个人道德问题,而且关系到用什么人格影响学生的问题,关系到大学的文化建设问题。

学术腐败有制度问题,也有个人学风修养问题。大学文化建设与功利主义是对立的。当然办大学不能不讲功利,但不能成为功利主义。在制度方面要改变急功近利的那种重量不重质的要求,改变那种“计件工资”制度,对教师最好实行年薪制,鼓励教师坐冷板凳,出优秀成果。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向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推荐陈寅恪。校长问,陈寅恪在哪里获得的博士学位?梁启超说,没有学位。校长又问,有什么著作?梁启超说,没有著作。校长说,既没有学位又没有著作怎么能当大学教授。梁启超说,要说著作,我的著作可算等身,但我这些著作抵不上陈寅恪的几句话有价值。于是陈寅恪就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位国学大师之一,名垂青史。所以说,做学问不一定要出多少书,更重要的要有真学问。

在学风建设方面,学校领导要带好头。学校领导要重视学校的学术研究,建立学术核心。这就要依靠教师,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如果学校领导是学者,也应该融入教师的团队中,不要与教师去争项目争奖项。现在许多评奖都变了味。就拿教学优秀成果奖来说,我曾担任过三届评选委员会的副主任,我记得当初国家教委设立教学优秀成果奖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鼓励第一线的教师提高教学质量,要像奖励科研成果一样奖励教学成果,因此当时鼓励奖给教师个人。第一届的一等奖获得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物理教

师,第二届的一等奖获得者是上海幼儿师范专科学校的一位数学教师,都是奖给教学工作突出的教师。但是近几年来变了味,申报的大多是校长牵头的所谓教学改革。近两届求我来推荐的尽是校长牵头的集体项目。我不能说他们的教学改革不好,更不能说他们不应该领导教学改革。但这却与评选教学优秀成果奖的宗旨相悖。这种争奖项的风气对学校的学风建设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这是大学文化缺失的又一个方面。

当前大学文化缺失的另一种现象是行政化太浓。这既表现在形式上,也表现在内容上。表现在形式上、制度上是行政层次太多,办一件事情要经过层层审批。有些事情领导之间互不通气,互相推诿。领导与教师互不沟通,互不交心。过去学校领导都有几位教授朋友,时常交流,现在的校长能和几个教师成为朋友?行政化表现在内容上就是教授在办学上,在学校发展上,在学科、专业发展上几乎没有发言权,都是学校行政会议作决定。这样就形成不了学校共同的愿景,学校行政的决定未必为广大教师所认同,形成不了统一的学校文化。

当前大学文化的缺失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市场化,见物不见人。最近就有研究生向我反映,说研究生毕业了对母校没有感情。我问为什么?她说,后勤限定他们一天之内就必须把房子腾出来,同学们感到太不讲人情,有的女同学哭起来。我分析,学校后勤让学生腾房也有道理,宿舍要修缮,要迎接新同学。但是否可以更人性化一些,预备一些周转房等。有些是让学生早点出去,可以把房租出去。学校的市场化当然主要不在后勤,更主要的是把知识商品化。学校为了营利,办一些与大学本质没有联系的培训班,有些教师在外面讲课还有经纪人,有一定出场费等。当然,按劳取酬,无可非议,但与大学应有的文化精神总有些格格不入。

大学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在不断冲突和融合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因此,大学文化建设要克服上述大学文化的种种缺失,通过冲突逐渐达到融合,最后回归到大学的本质。

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大学文化首先要认同社会的主流文化。改革开放、继承创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建设和谐社会,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大学是各种文化交汇的场所,是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因此,大学文化要在各种文化冲突和融合中,选择符合国情,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文化,创造中国特色的大学新文化。

来源:教育研究,2010年01期

大学文化建设当回归本质 追求特色

中国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 郭传杰

近年来,大学文化建设的问题较之以往受到更多关注,但总体来说还是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即:“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理解上不同,结果上雷同;少数人重视,多数人忽视”。大学文化真的能被这样对待吗?当然不能!我认为,文化之于大学,是大学的内在灵魂,是决定一所大学水准高低和前途命运的东西。

文化建设是大学对时代要求的回应

大学的最基本使命是育人,教育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教育与文化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文化以人为载体,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就是人化,就是化人。以人为本是教育的应有之义,育人必须拥有良好的文化环境。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信息网络化为特征的崭新时代。在世界范围内,新一轮高等教育的理念提升和深刻变革正在进行,教育和大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使命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大学将会逐步从工业经济社会的边缘进入到知识经济社会的中心。时代强烈呼唤大学不仅服务而且应当引导社会前进,即不仅要为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服务,还要以自己的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文化自觉地引导社会前进。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就前瞻性地提出了“必要的乌托邦”这一命题,要求大学不能只是单纯地培养人才和发展知识为社会所用,而且必须有一种着眼于未来的精神,保留其对于超越实利的、非功利价值的追求。大学既应当走出“象牙塔”,又需要超越“象牙塔”,既要应对文明社会众多领域的实际需求,又要具有超凡脱俗的文化品位和独立品格,以引领文化发展作为自己的社会担当。所以说,大学文化建设是大学对时代要求的回应。

没有特色不成真正的文化

文化是有生命的,必须是活的。否则,它就不会延续发展。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生命体征,即便也被称其为“文化”,它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化。因而,特色也是文化的伴随物,凡文化一定有自己的个性特色。

但令人遗憾的是,过去十来年,在我国大学规模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新的大学来不及形成自己的特点,一些原有特色的大学又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无论是核心价值理念,还是目标、学科,甚至校训、

徽记等形式载体,都逐步地趋同,以至于人们称之为“千校一面”。特色缺失是当今大学文化建设中一个普遍问题,许多人认同“没有特色是今天中国许多大学的特色”。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学缺少办学的自主权,一些办学自身缺少对大学文化的深刻认知。

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真正的一流大学,都会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味儿”。有特色的学校未必就是一流的,但没有特色的大学肯定不会是一流的。在整个高等教育的生态圈中,特色,都应该是每个管理者、办学,以及任何一所大学在生存发展过程中追寻的一个目标。

要把大学文化建设融入《纲要》实施全过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和实施,无疑会给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也会给大学文化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具体来看,一是国家和社会对教育,包括对大学的关注和理解都提升了一个层次,大学不仅要脚踏实地为社会服务,还要“仰望星空”,要提升大学的理念与使命感。二是在体制机制方面一系列的改革举措,特别是围绕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而进行的去行政化改革,将为大学回归大学本质,落实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术自由等方面铺设道路,这实际上也就是大学的制度文化建设,并将为大学精神文化的重建开辟空间。三是随着《纲要》的实施,大学经费投入会有增加,这也会利于大学器物文化校园建设提供条件。

不过,在整个的《纲要》文本中,基本上少有涉及大学文化这个命题的文字。在前几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制定时,20个重大专题中专门安排了一个创新文化专题,在《科技纲要》最终文本中,也有专门章节强调创新文化建设。我以为,文化之于教育,特别是大学文化之于高等教育,其地位及作用绝不亚于文化之于科技工作。因此,应把文化建设寓于《纲要》实施的全过程,而不要分割开来,更不要滞后进行。另外,文化的形成与建设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和模式,要持之以恒,方能有效。忌搞运动,不能急于求成,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搞评议检查。

来源:人民政协报,2010年/5月/12日/第C02版

大学校长与大学文化特色建设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陈灿芬

大学文化特色一般从大学所特有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等层面,通过价值取向、办学理念、教育思想以及人才培养等方式体现出来。这些相对持久稳定的个性特色,是一所学校与众不同的标志,是其特有的优势和持续发展的动力,也是一所大学存在的重要原因。每一所大学都需要追求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华中科技大校长李培根院士因此认为:“不能形成自己文化的学校不是好学校。”然而,文化的建构,特别是大学文化特色的建构是缓缓积淀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高校对大学文化特色建构问题要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并作为大学发展的一种文化战略,给予高度重视并长期坚持。

大学校长是本单位行政最高管理者和决策者。大学文化如何创建,尤其是大学文化特色能否发展,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的认识和意志,甚至还与其人格操守、专业背景及个性趣味等发生密切的关系。如何利用自己作为学校行政首长的身份,通过大学文化特色建设促进学校教育目标的实现,是值得大学校长们严肃思考的问题。

一、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决定着大学文化及其特色的兴衰存废

一个成功的大学校长应该是高瞻远瞩、胸有沟壑的领导人,还应该是理念鲜明的教育家。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他应该善于贯彻自己成熟而出色的办学思想并以此影响和促进大学文化的生成发育。考察各具特色的大学文化,不难发现,作为文化建设引导者的大学校长,他们的治校理念与大学文化是相互影响着的。一方面,大学理念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受制于所在大学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理念。大学理念是大学校长治校办学的根本宗旨,大学校长应是大学理念的执行者和捍卫者。另一方面,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也会对大学理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刻的乃至深远的影响。大学校长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大学理念,并善于运用理念治校、运用文化育人。

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曾涌现出了

一批优秀的大学校长,除了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北大蔡元培、清华梅贻琦等外,还如浙大竺可桢,复旦大学李登辉,南开大学张伯苓,北京师范大学陈宝泉,东南大学郭秉文,四川大学任鸿隽,云南大学熊庆来,广西大学马君武等一大批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办学理念鲜明高远,体现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本质特征;他们的治校方略实际可行,蕴含着高等学校教育管理的基本规律。武汉大学程斯辉教授认为,中国近代这些优秀的大学校长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八大特色,即把握大学使命,彰显大学精神,办理想、境界高远的大学;尊重学术研究规律,维护学术尊严,办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大学;重视学校管理的建章立制,办运行有序的制度化大学;注重教授治校与学生自治,构建富有活力的、民主的大学;严格培养过程管理,努力办高质量的大学;既重视开源,更重视节流,办节约型大学;集中力量,形成优势,办有特色的大学;通盘筹划学校发展,创建环境优美、校风纯正的大学。总结优秀的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与特色,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而且对当代大学文化特色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例如:有着留美经历的梅贻琦对自由、民主有深刻的理解,担任清华大学校长16年间,他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识教育”等教育理念对清华大学的校风、学风形成很大的影响,也奠定了清华园求真务实、追求民主的文化底蕴;他执掌西南联大时,这些教育理念同样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中国大西南取得了丰硕果实。可以说如今清华大学严谨的学风正是对当年老校长办学思想的秉承和发扬。

而在老北大,蔡元培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指导下,任命与自己政治见解有分歧的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引进思想激进的陈独秀,聘请27岁的胡适为教授……这些都成为蔡元培开明办学思想的最佳注释。蔡元培还非常重视学校社团的建设和管理,认为研究学理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学校应组织各种社团,用以涵养心灵,达到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的目的。在

蔡元培的领导和促成下,北京大学曾创办了各种学术团体和社会团体,如新闻研究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进德会、体育会、雄辩会、新潮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等,这些社团和学会丰富了大学文化,促进了教师和学生的学习和研究。这种宝贵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以致人们戏称北大的学生社团活动为“百团大战”,成为北大校园文化最具特色最令人欣羡的内容之一。

近几年,一些著名大学的校长纷纷呼吁素质教育、人文教育,各类传统文化教育受到普遍重视,文学艺术活动蓬勃开展,特别是文学大师纷纷进入高等学府执掌教鞭,从而为大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在管华诗院士任校长期间,中国海洋大学特聘作家王蒙担任文学院院长,对他的建议和构想从谏如流,文学院得以设立“名家课程”,建立“驻校作家”机制,借王蒙的影响力邀请一批著名学者定期来海大讲学。这些大师名家进驻大学,给师生做专题讲座,指导师生开展学术沙龙活动,接受师生访谈,活跃了大学的学术文化气氛。正是因为有校长的倡导和支持,专家、学者乃至大师才有了参与和组织大学文化活动、发挥各自优势的机会,进而才有更多的大师名家响应和更多的师生参与,大学文化才得以繁荣。

这些优秀的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直接奠定了这些大学文化特色形成的基础和发展方向。由此可见,探寻优秀校长的治校理念,弘扬他们的优良传统,有利于大学文化特色的形成。

二、大学校长的人格操守直接关联着大学文化的精神风骨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有相当的专业修养的大学校长,其言行举止所体现出的人格操守更将成为大学师生关注的焦点甚至效尤的对象;崇高的人格和严谨的操守将使校长的行政权威极大提升,并自然惠及校园风气,使大学文化呈现可贵的精神风骨。

中国现代高教史上,竺可桢校长靠自己的个性坚守、人格魅力直接主导了浙江大学的大学文化特色的塑造特别是推动了“求是”校风的形成,这就是一个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典型例子。

1936年4月,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他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经验,继承并发扬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自由民主的办学方针,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同时,他十分赞赏浙大所

特有的自求是书院以来一脉相承的朴实严谨的传统学风,并把它概括为“诚”、“勤”两个字。在他民主、自由的办学方针吸引下,在他的崇高人格感召下,浙大汇集了不少崇尚科学民主、追求真理、有真才实学、有社会责任感的好教授如费巩、王淦昌、蔡邦华等。正是在竺可桢校长充满人格魅力的治校风格作用下,作为“流亡大学”的浙大奇迹般地抗战前的一所普通地方性大学一跃而成为不少专业在全国享有盛名的综合性大学,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竺可桢所确立的“求是”校训,不仅是治学准则,也是做人的准则。他自己就是“求是”精神的身体力行者。他在1938年11月所作的《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的讲演中,尖锐地批评“一般知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训‘求是’的精神相悖谬”。他一贯支持校园民主,如大胆起用无党无派、敢于仗义执言的政治学教授费巩出任训导长;1942年1月“倒孔”运动时,他亲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保护学生;学生于子三被害后,竺可桢严词拒绝在“于子三自杀身死”的证明上签字,并对新闻记者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消息见报后震惊全国。竺可桢的人格力量和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对塑造老浙大的精神风骨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老浙大曾被誉为“东方剑桥”、“民主堡垒”绝不是偶然的,是和这位好校长分不开的。

校长的人格操守还关系到学校发展所必须的改革能否展开、学术思想能否丰富和创新。大学是思想文化的重镇,是学术创新的摇篮,对原创性和开拓性有突出的要求。而这样的原创与开拓的起点,又必然是对既成的思想、学术体系的怀疑、批判以至反叛。如果一个校长不思进取,怕担风险,只图维持现状,以守住既得利益为目标,那些超前的观念和叛逆性的思想就会因为得不到必要的学术环境的充分酝酿和行政资源的良性支持而夭折,开拓进取、正气凛然的校园氛围也就很难形成。反之,在一个心胸开阔、无私无畏的校长麾下,将会聚集起众多充满探索意识和革新精神的知识精英与思想先锋,一所大学才会呈现充满活力和生机的令人鼓舞的气象。

20世纪80年代,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先生敢为天下先,开展教育制度的改革,不拘

一格选拔任用各种人才,如杨小凯、邹恒甫等有才华但也备受争议的人物都得到了刘校长的关照;那个时期武大实行的插班生制度接收了一批后来很有成就的特殊学员;而两届作家班也培养和团结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这些举措使那个时期的武大进入了一个具有独立自由精神和活跃民主气氛的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至今令人留念。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大胆革新,敢于对不合时弊说不,特别是在高校本科教学水平工作评估过程中,不逢迎,不作假,实事求是,坚信自己的实力,坚持“原生态迎评”,不仅给其它高校竖立了一根难于企及的标杆,更重要的是以实际行动给学生上了诚信的一课。他不跟风,不盲从,按科学规律办事。前些年,大学里刮了无数次风,比如大兴土木风、扩招风、老师下海风,等等,但中科大神清气定,不为所动。而对谋定的事,他则坚持到底,如对科大首创、至今还在坚持的“少年班”一直呵护有加,当一些人对“少年班”发出质疑,其它高校陆续撤销办班时,他以实际数据肯定并宣传中科大少年班“办得很成功”。从创办时的全国首家,到现在的几乎全国仅存,科大少年班真正成为了国内高校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校长人格魅力与职业操守发挥的积极作用。

三、大学校长的专业修养可以改变大学文化的学术质地与含量

在大学里,大师是思维最活跃、学术水平最高、具有个性特色并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群体,他们对大学文化的建设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他们本身就是大学文化的独特风景,是大学文化特色的体现。通常情况下,一所大学的校长一般也是学有专长、卓有建树的学者,特别是名牌、老牌大学的校长往往本身就堪称大师。因而,在大学文化特色建构过程中,校长的专业修养和学术出身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校长在治校过程中必然要流露出他独特的专业出身和学养的特点,这也是所谓“专家治校”的最本色体现。如理工科出身的学者主政和文科出身的学者主政,会影响到学校的文化质地与风气,像蔡元培当年是抱着整顿北大的决心接受任命的,而他整顿的切入点就是他所熟悉的文科领域,这也是为什么他上任伊始,就要力排众议大胆延聘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一批人文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的基本原因。这是一种很自然的选

择,因为作为专家的校长治校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自己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出发,运用其赖以成功治学的训练传统包括思维、方法甚至关注方向等展开工作,这样必然使得大学日常工作的运转和大学文化的面貌都打上校长的专业烙印。

专家型校长对大学的学科专业乃至课程建立与学术发展水平往往具有决定性影响。长期的高等教育实践证明,高校学科设置大而全未必就能高精尖,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所有专业方向独执牛耳,纵然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高校也是如此。一般而言,大学最现实的发展思路恐怕更是要靠特色办学,而专业特色往往会促进大学文化特色的形成。有人说清华学风严谨务实,北大学风开放活跃,无疑都与这两校多年来形成的工科和文理科的学科传统优势有关系,也与其长期以来多位校长的学术出身有关系。如清华的梅贻琦、叶企孙、王大中、顾秉林等多为有很深专业造诣的科学家出身,北大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马寅初等则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知名。他们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卓有建树、得心应手,在考虑学校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也自然会在相关领域有更多的发言权。更现实的情景是,在社会各界及相关部门眼中这些学科领域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学校的“名片”和“招牌”而被投以特别的关注,它们得到优先发展并进而影响到学校的文化格局与学术内涵,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方面的典型还如黄伯云校长和他的中南大学。黄伯云教授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在美国完成硕士、博士、博士后学业回国的留学人员,是我国著名材料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从事粉末冶金等领域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担任校长后他仍然是该学科的带头人,他和他的前辈(如黄培云院士等)及同事一起,经过长期不懈地艰苦努力和言传身教确立了该校粉末冶金专业在全国的领先水平,该校粉末冶金研究所也发展成为我国第一个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正是因为有像黄伯云这样的大师级科研群体,中南大学才有粉末冶金这样的精品学科专业;另一方面,也是有了黄伯云这样的大师级校长,中南大学在全国大学群体、中南大学相关学科在全国大学同类学科中才更有影响力,该校因此才更能凝聚人心、团结人才、呈现更和谐上进的局面,该校大学文化的“科技含量”无疑因为黄校长及其科研群体而大大提高了,这

也因此成为了中南大学文化的特色之一。

四、大学校长的个性趣味必然影响到大学文化的构成与品位

领导者的行事风格往往会打上其个性趣味的印记,而领导风格对组织氛围、组织文化创建的意义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诸多经典研究也揭示了这一点。因此在研究校长与大学文化的特色建设之关系时,不能忽视校长作为任何普通人都具有的个性特征与生活情趣等私人因素的作用。

有研究者依据利思伍德等人的实证分析,阐述了校长领导风格与创建学校文化的关联。利思伍德等把校长的领导风格分为四类:一是人文主义领导风格:这种风格的特色是瞄准人际关系。即通过形成学校真正合作性氛围、多样性的沟通与学区中央办公室的合作关系,谋求学校改善。采取这种风格的校长认为,这种合作关系对于全校的成功至关重要,而且也是学校完成更多工作的必要出发点。二是解决问题领导风格:这种风格把焦点置于学生的学习成果及其发展上。采取这种风格的校长把学生的成就与发展本身作为领导行为的目标,为此采取多样的手段。三是计划程序领导风格:以课程为关注焦点。采取这种风格的校长为了确保有效的课程,致力于开发改进教员工能力的工作步骤。四是行政领导风格:这种风格专注于学校日常管理的组织运作,谋求在经费预算、日常事务、人事管理、来自他人的信息要求等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这种风格在教学法、课程的决策之类的工作上不花太多的时间,表现出应付危机、应对学校各种要求的倾向。

从上述分类可知,校长的领导风格可谓春兰秋菊,各有千秋。而校长的个性趣味是决定领导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从优秀校长的个性趣味中追寻出大学文化的特色;同样,一所学校的大学文化特色也必定会带有校长个性的烙印。

例如,金陵女子大学第一任女校长、留美生物学博士吴贻芳1928年一上任,就以自己女性的细腻、博爱和温柔,在学校推行各种有别于男校的措施,让金陵女校办出了特色。如她对校训“厚生”的宣讲就很有特点:“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造福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富。”她还针对女校实际,重视社会实践,创办乡村服务处,设立幼儿园、妇女

班,引导学生教乡村妇女儿童识字、唱歌、学习卫生常识等。她的努力,打破了当时社会对妇女就业的种种限制,取得了中外教育界公认的好效果。

当代中国机械工程专家、中科院院士杨叔子也曾是一位通过自己的个性趣味深刻影响大学文化建设的大学校长。杨叔子国学修养深厚,热爱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时,他极力倡导大学人文教育,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他甚至亲自通过讲座和网络组织各种文史典籍的读书讲座活动、传统诗词学习诵读活动等,在全国教育界特别是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誉为中国教育界人文素质教育的旗手。在他的推动下,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科布局更加全面、结构更加合理,校园人文氛围更加浓郁,完全没有常人印象中传统理工科院校那种刻板机械、缺乏情趣的感觉。

可见,大学校长的个性趣味和领导风格深深影响着大学文化的构建,引导着大学文化走向有特色、高品位之路。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校长是学校的灵魂,要评论一所学校,先要评论他的校长。”从大学文化方面看,大学文化也会从多个角度反映出校长本人特有的人格魅力、价值观念、治校理念、领导风格和个性趣味。有人认为,“对于校长而言,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创建一个有效的文化,最根本的工作就是充当文化领导者。”要建设大学文化,“校长其实是一个灵魂,一个领头羊。这是因为学校文化中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建设是学校变革的导向,是学校持续发展的动力。而学校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形成和建设首先是校长的事。”所以说,校长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领导者和总设计师,对大学文化建设和特色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来源:社会科学家,2010年07期

我国现代大学文化的价值取向

临沂师范学院 韩延明, 栾兆云

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 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键所在, 是大学存在与发展的核心, 在大学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伴随着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我国大学面临着种种矛盾, 严重影响了我国大学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因此, 正确认识这些矛盾, 深刻理解我国现代大学文化的价值取向, 对促进我国大学和谐发展, 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我国大学文化式微原因检视及其应然选择

进入21世纪, “当代大学正面临着都市化、市场化、功利化、教育大众化等多重压力, 大学文化正在接受严峻的考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大学已由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 政府、社会与公众对大学的要求愈来愈高。仔细检视, 导致当前我国大学文化式微的原因, 既有来自大学外部的客观原因, 也不乏大学自身的主观原因。

1. 大学独立性与依附性的矛盾导致大学文化式微

独立性是现代大学的重要特征之一, 包括大学办学的自主权, 教师教学治学的独立性, 学生自主学习的独立性等。这种独立性是由大学的性质与职能所决定的, 它既是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 也是大学直接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并求得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当然, 这种独立性并不是完全脱离政府与社会的绝对独立, 而是相对独立, 大学在独立的基础上仍需要政府与社会的支持和援助。

所谓依附性, 首先, 是指大学对政府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不同于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的依靠, 而是大学完全沦为政府的分支机构和附属品, 成为“官本位”中的某一科层, 成为一个完全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机构。显然, 现代大学的独立性特质与大学对政府依附性的现实是矛盾的, 其实质是学术本位与行政本位的矛盾。其次, 是指大学对社会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主要表现在大学为了发挥服务社会的职能, 一味地追随经济社会的短时需求, 完全沦为单纯为社会服务的“加油站”、“动力站”, 从而失去了自身的精神气质, 丢弃了大学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本职, 成为经济社会的附庸, 并由此产生学术性与市场化的矛盾。

解决大学的独立性与依附性这一矛盾的关键, 在于准确把握大学的性质与使命。其一, 大学是以培养高级人才和从事学术研究为己任的文化教育机构, 它以

文化传承与创新为宗旨, 在社会的基本结构中属于文化的范畴, 具有教育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属性。因此, 大学不应也不能充当政府的分支机构和附属品。大学之所以是大学, 就因为大学充分体现了教育的本质, 有着不同于其他社会机构的社会责任和独特属性。“大学之大, 在于精神之立。”大学具有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替代的精神和功能, 即它具有自身独特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独立性。美国密西根大学前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特(James J Duderstadt)也指出: “在知识时代, 受过教育的人和他们的思想已成为国家的财富。大学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重要, 大学教育的价值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之高。”因此, 大学更应该坚守自己的独立性, 在知识经济社会的前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承担起引领社会前进的使命, 而不是淹没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 失去自身的立世之本。其二, 从整体上讲, 大学同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着直接的联系, 并通过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为社会的各个领域提供服务, 由此派生出其他多种社会属性与功能, 如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市场等属性与功能。但需要指出的是, 大学的本质属性可以包容其他多种属性, 而其他任何一种属性都不能取代其本质属性。因此, 大学虽具有政治的属性与功能, 要为一定的政治服务, 如大学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其政治属性和功能的直接体现, 但大学不能“政治化”; 大学虽具有生产的属性与功能, 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服务, 尤其是要为科技的发展服务, 但大学不能成为经济部门而“产业化”; 大学虽具有一定的市场的属性与功能, 要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 其自身的运行也需要部分地引入市场机制, 但大学不能“泛市场化”。概言之, 扭曲或丢弃了大学的本质属性, 大学就难以成为大学。

大学文化之于社会, 主要有凝聚、激励、导向、规范和陶冶等功能。“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 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是国家意志、历史传统、社会趋势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体, 是时代精神的表征, 是社会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曾说过, 大学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心机构, 大学教育之良莠足以影响乃至决定一个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盛衰。因此, 从大学的性质和使命出发, 我们应当正确处理高校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保证大学的相对独立性,

真正实现“政府宏观调控,高校自主办学”的科教兴国方略。

2. 大学的学术性与功利性的矛盾导致大学文化式微

20世纪以来,在社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中,伴随着政治民主、经济增长、科技革命、人口激增、信息万变等过程,大学的角色和职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人们用多元化、巨型化、国际化这样的概念来描述现代大学。大学毋庸置疑地成为社会文明的“思想库”、科技推广的“孵化室”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而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然而,大学文化的衰微也已成为世界性的话题和难题。

大学办学目标的功利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如果大学办学不积极主动地为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服务,不帮助大学生寻求实用和令人满意的职业,大学则很难生存下去。但当前社会上充斥着浓厚的功利主义、市场主义色彩,若大学只是跟着市场走,缺乏远见卓识和崇高理想,甚至出现学术腐败现象,那么,大学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正是当前我国大学存在众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

妥善解决大学学术性与功利性的矛盾,就需要真正领悟学术的真谛,排除功利主义的干扰,坚持学术的探索精神。所谓学术精神,是指在探究、辨析真理和传播、弘扬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地追求真理、以真理为旨归的精神。同时,学术精神也是一种人格,即治学者的独立主体人格与对学术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它主要体现在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知识成果。

大学本身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圣殿,学者做研究不应该有功利性,而是本着“十年磨一剑”的态度和精神潜心钻研,最终取得丰硕成果。大学要守护学术,彰显大学精神的核心即在于坚守学术自由。学术自由的关键是思想自由,并且只有思想自由才能保证大学的思想是活的思想,是流动的、创生的、开放的、多元的思想,而不是封闭的、静态的、守旧的、单一的思想,是万紫千红而不是一花独秀。惟此,才能以思想去激励焕发思想,以智慧去启迪开发智慧,才可能立足时代又超越时代,扎根现实又超越现实,服务社会又导引社会。正如布鲁贝克(John S. Brubacher)所言:“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还是真理行使自由的先决条件……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由此,可以说自由、分散、专

业化、联合体是产生不同思想的基础,也是保证不同思想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充分发扬学术自由,提供广阔的学术空间,大学才能出现“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大学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3. 教授治校与管理科层化的矛盾导致大学文化式微

教授治校是西方大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传统的管理理念。它形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伴随着西方大学近千年的发展演变而经久不衰。作为一种大学民主管理的传统理念,教授治校至今仍是现代大学管理者努力追求的理想。在高等学校从社会边缘走进社会中心的态势下,高校的科层管理日益膨胀和细化,出现了行政权力泛化和学术权力行政化与官僚化等不良现象,严重影响了高等学校的本质属性——学术自由,危害了高等学校的健康持续发展。

本真意义上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虽然在管理体制、表现形式、价值追求等方面有所不同,但二者却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形成合力,共同构成大学的权力系统,保障大学功能的有效发挥,从而实现大学的教育目标。但是,目前我国大学行政权力泛化的现象比较严重,“中国大学目前森严的行政等级结构与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无异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狭隘的认识:判断来自组织的顶层,而行为在底层;中层管理人员的作用是综合来自高层的信息,指导、监控下层人员。这实际上是无视大学作为一个教育组织的特殊性”。

教授治校意指通过大学宪章或规程以及一定的组织形式,由教授执掌大学内部的全部或主要事务,尤其是学术事务的决策权,并对外维护学校的自主与自治。这里所说的教授,是一个集合概念,即教授集体管理大学和学术事务。因此,所谓教授治校并不意味着任一作为个体的教授都直接拥有治校的权力,而是对教授团体管理大学的强调,如教授委员会。

教授治校的本质是教授治学。在学校管理中,理应践行教授治校的管理理念。借鉴西方大学的经验,根据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或不同的事务管辖区域成立委员会,也可以吸引外部人员或个别行政人员参与,但是必须保证教授的绝对地位,使各方面工作以学术发展为中心,更好地为学校的学术拓展服务。在做事关学校发展的重大决策时,学校管理层必须组织各教授委员会深入分析,反复讨论,最终由教授委员会集中做出决策,以保证大学不受社会其他因素的支配,避免行政权力的独断专行。

教授治校的宗旨,是维护大学的学术权力。探究高深学问是大学存在的根本,这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

“自由”。只有能够理解高深知识的复杂性并精通高深学问的学者才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所言:“教师就应该广泛控制学术活动。由于他们最清楚高深学问的内容,因此他们最有资格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以及如何讲授。此外,教师还应该决定谁最有资格学习高深学问(招生),谁已经掌握了知识(考试)并应该获得学位(毕业要求)。更显而易见的是,教师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谁最有资格成为教授。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是他们的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侵犯的公证人。”因此,大学作为一个对高深知识进行选择、传承、批判和创新的场所,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专业性。由此,在大学中,掌握高深知识的教授必须享有最大的权力。此外,大学的其他事务都是与传递和探究高深知识息息相关的,理应为更好地行使学术权力服务。

4.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矛盾导致大学文化式微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个性和尊严,重视对人类存在的终极关怀。科学精神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其核心是客观的理性原则和求实精神,以及不断求知、不断创新、不断追求真理、不迷信权威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在走向现代化生活的今天,大学生的学习出现了狭窄化、专门化、技能化的倾向。首先,“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使学习成了机械训练和应付考试的枯燥过程,生活成为注重实用、只对“糊口”的专业、技能感兴趣的单性化生活;个性与创造性逐渐消隐,在附和潮流之中将心理封闭起来,进而导致情绪抑郁、性格孤僻而不善于心灵交流。远大的人生抱负渐渐淡消,卓越的眼光和博大的胸襟逐渐被市侩式的世故虚荣所取代……当代大学生在面对学习环境与任务的适应、人际关系的处理以及感情和就业问题时往往无所适从而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因此走向极端。其次,大学生的诚信问题诸如作业抄袭、考试作弊、剽窃他人学术成果、伪造求职履历、恶意拖欠学费等也多为社会所关注。此外,多数大学生缺乏创新精神,完全被动地应付各门课程的学习,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训练与提升。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极力主张:“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造成大学生这种精神面貌和行为表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学人文精神的缺失。

美国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Robert M. Hutchins)认为:“行业上的诀窍不能在一所大学中学

到,而且如果能够学到这些诀窍,也不应该去学。之所以不能在一所大学中学到,是因为这些诀窍容易过时,并为新的诀窍所代替;是因为大学中的教师知识容易陈旧,不能掌握新的诀窍;是因为这些诀窍只能在它们能够被使用的实际情景中才能学到。”^[4]而且,职业教育主义会导致肤浅和孤立。它贬低了课程和教职人员的价值。它剥夺了大学惟一的生存理由,即在不受功利或‘结果’的压力牵制的情况下,为追求真理提供一个天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指出,教育首先是培养人,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不是首先去传授知识与技术,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归纳力、理解力,以便他们在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在费希特看来,实用性、服务现实,只是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结果之一或副产品,不是出发点,也不是目的。

二、现代大学文化应有的价值取向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兴盛,大学已由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大学的发展愈来愈引起社会、政府、民众以及大学自身的普遍关注。除教学与科研之外,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得以凸显。在高等教育面向市场的背景下,牢固把握大学作为社会文化组织的文化属性,理性分析现代大学文化的价值取向,促进大学的和谐发展,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1. 维护大学自治,促进和谐发展

所谓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作为社会法人机构,不受政府、教会或其他机构的控制或干预,能够独立地决定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计划,并付诸实施。在我国,大学自治的同义词是办学自主权。事实上,无论中外,大学的发展不可能完全不受外部支配与干涉,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行使大学办学自主权。这是大学按照自身的逻辑正常发展所必需的,是秉承大学高贵品格、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权力保障。

现代大学既是人才输出和科研创新的重要基地,也是先进文化的创造与传播阵地,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现代大学作为传承知识、创新知识、播撒文明的教育圣地,其所坚持的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起着示范和引领作用,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灯塔”。在我国,彰显大学文化,确立和谐理念,是建设和谐大学的需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2. 坚守学术自由,彰显卓越意识

《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庄严宣告: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21世纪大学发展的永恒原则。学术

自由根源于思想自由,是一种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大学文化。大学作为学问之府,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不是消极地顺应社会,而是对社会发挥着批判、监督、匡正和导向的作用,它不断地超越社会现实,不断地孕育和产生新思想。以新的思想引导社会,以新的人才和新的知识成果服务社会,历来是大学的神圣使命。“学术自由、文化创新、真理至上”是大学精神的根本体现。现代大学不仅仅满足于文化和思想的继承和传播,更凸显出强烈的卓越意识。大学不仅传递文化,更重要的是通过选择、批判和创新文化,使大学成为社会“新文化”的生长点,并通过培养大量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人才,对传统的和现有的规则进行批判与挑战,以此推动社会前进。

现代大学追求卓越,鼓励学生的探究精神,尊重学生的创新个性。这种理论和实践可以锻炼学生的心智和思维方式,对学生的影响举足轻重。大学生的学术研究活动是大学教学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杰拉德·卡斯帕尔(Jerhard Casper)在纪念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吸引天才的学生并与他们在一种平等气氛下相互探讨交流是成功的关键”。他还进一步引用了斯坦福工学院前院长吉玻恩斯(James. Gibbons)的话,指出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参与科学研究,获得的正是“运用基本原理进行思考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培养可以产生创新的种子”。“创新的种子”可以孕育和发展创新的文化,并由此培养和造就创新型人才。更重要的是,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源头活水,也是大学追求卓越的必由之路。

3. 凸显人文关怀,塑造健全人格

“人文关怀”的实质,是对人的关怀。“人文”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它与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独立人格、人的个性、人的生存和生活及其意义、人的理想及人的命运等密切相关。大学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立足点和归宿是人,它最终的目标是解放人、发展人、完善人。人,首先是一种物质存在,但从本质上讲,更是一种精神存在,人靠一种精神区别于社会上存在的其他物种。大学同样需要一种精神,并以这种精神表征自身的存在。这种精神是无形的,却是巨大的:它滋养着学人的人格、理想,孕育着更加卓越的精神文化,以此为社会树立一个精神价值尺度,成为一代代学子的精神家园。因此,对这种精神的守望,是大学人矢志不移的终身职责。

一个社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尤其体现在大学的人文思想之中。科技的实用性、功利性崇尚“短、

平、快”,而人文精神的陶冶很难获得“短期效应”,却具有更根本的“塑造性”作用。人文科学本身的精神积累性和价值重建性,使其完全不同于科技的革命性和维新性,它不会摒弃悠久的文化传统,相反,它使人不断寻找“自我”,推动人们抛弃功利主义并返回生命存在的本源去发现现代社会的生存意义。大学作为促进人与社会发展的特殊途径和特定场所,不仅要产生思想和学问,还要为社会提供道德理想;不仅要培养负责任的、合格的公民,还要为社会提供实践的行为模式。因而,真正的人文理性重建的基点应该是在充满希望的大学中。

那么,大学如何卓有成效地凸显人文关怀、塑造健全人格呢?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正确认识人文教育的价值。人文教育重在通过掌握人文知识,获得处理人类自身内部关系的能力,以达到改造人的精神世界,并指导人们运用正确的价值准则去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目的。其次,大学必须推进通识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此,应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互渗透。最后,要营造充满人文情怀的校园环境。良好的校园环境可以使学生净化灵魂、升华人格、完善自我,可以使学生感受到有催人奋进的动力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时刻激励着自己。

4.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创新能力

科学的精神就是求真的精神。科学的目的是去伪求真,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怀疑,有怀疑才能推动科学不断进步。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各行各业不断向前推进的生力军和接班人。学校在培养他们具有一定的人文素养的同时,也应该使他们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培养他们养成高远的科学视界、理性的科学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敏捷的科学思维,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已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科技,关键是人才,基础在教育。在一个以智能投入为基础的社会里,财富积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都离不开知识。经济全球化催生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人才是社会第一位战略资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与经济文化紧密相联,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信息和精神是可再生性资源,素质和能力是可创新性财富,能够提升科学知识的艺术化。因此,更新理念,强化学生素质的提高及能力培养,是大学教育与教学改革的关键。

5. 崇尚多元文化,追求文化认同

大学对社会的文化建设具有强烈的辐射功能、示范功能和批判功能。如何发挥这些功能使大学成为文

试论大学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几个误区

宝鸡文理学院 孙 新

一、误区之一:离开大学本质研究和建设大学文化

第一,离开大学本质研究和建设大学文化,不能正确把握大学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内涵。大学的本质是对大学是什么的深刻反映,是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基本定位问题,是大学文化生成的逻辑起点,大学内部各子系统的科学运行都依赖于对大学本质的正确认识。大学文化影响着大学的发展方向、发展质量和发展特色,大学文化的基本内涵建设应紧紧围绕对大学本质的深刻认识来展开。只有如此,大学文化建设的方向才不会偏离正确的航道,也只有如此,才能把握大学文化建设的本质,使得大学文化更加符合大学发展的实际。

第二,大学的本质决定了大学文化研究和建设的方向、轨迹和内容,大学文化要建立在在大学本质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大学的本质就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新价值观和培育人才”,大学文化要依据大学的本质,把求实、求真、育人的大学文化理念贯穿在教学、科研和管理中,承担起培养青年学子、引领社会先进文化的责任。大学的本质具有共性,而大学文化虽是大学本质的反映,但大学所处的区域社会环境、文化的差异以及大学自身的历史沿革和传统的不同,使得不同大学的大学文化在反映大学本质的时候,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这就使得大学文化坚持个性化、差异化发展成为必然,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学文化发展的方向、轨迹等依然要受制于大学本质。

第三,当前的大学文化从根本上来讲,没有体现出大学本质。从表象上看,没有体现出大学文化的

.....
化建设的中心与源泉,已成为高等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提高高等教育的文化自觉,首先,必须重视并加强文化建设。大学是传承文化、实践文化并创造文化的重要场所,理应发挥其文化优势,不断提升其对社会文化的引领作用。其次,要尊重并融合多元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和谐文化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化,而不是摒弃异己、简单划一的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和谐大学的必然需要。建设和谐文化要求我们理性审视多元文化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把握好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倡导一种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文化环境

精神追求。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学风建设,也就是要体现出求真、求实、育人的大学本质。要教育我们的教师、研究人员和管理干部形成良好的学风,尤其要加强教师的学风建设和人格建设,以此引领青年学生勇于进取、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当前,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学术腐败现象,很不利于大学的文化建设。

二、误区之二:脱离社会文化体系研究和建设大学文化

第一,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文化要认同社会的主流文化。大学是追求真理、开展科学研究和传授知识的重要场所,它代表的是成人文化和主流文化,对年青一代进行教育,要求为人师者要认同成人文化和主流文化,代表先进文化,对青年学生施教。从深层上讲,教育自身就是一个文化系统,和文化比较起来具有相对独立性,教育既传播文化,又选择文化。文化选择的过程就是对主流文化认同的过程,是建构学生文化知识体系的过程,也是大学文化的建设过程。

第二,大学文化研究和建设要兼顾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两个层面。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是人类文化思想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它们虽然各有侧重,但文化的总体指向都是为了人的发展。当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从对立走向融合,这是当代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大学文化研究和建设时,要兼顾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这也比较符合大学文化的精神本质。优秀的大学文化应建立在人文与氛围,不断增强文化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一个民族在一定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下为回应生存环境的挑战和压力,积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系统、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民族精神,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中华民族要想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舞台上确立自己的稳定地位,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思考中华民族精神的活性化问题。21世纪中华民族精神的活性化,取决于我们在文化建设中达到的文化自觉程度。在此过程中,大学承担着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04期

文化和科学文化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应能够反映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精髓。大学文化中的求实、求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大学文化的育人功能是对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相融合的集中反映。总之,优秀的大学文化能够促进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协调发展,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

第三,大学文化研究和建设要正视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存在。处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大学文化,无时无刻不受到其他子文化系统的冲击。这其中,对大学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巨大的影响力和广泛的支配力,它浸淫青年学生的意识,改变青年学生的本能,由它所导致的大众文化霸权和文化生态环境危机,严重地冲击着大学文化。它常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进入大学校园,并迅速成为左右大学文化的不可抗拒的重要力量,对青年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态度、行为方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建设大学文化时,必须高度重视大众文化的影响力。

三、误区之三:忽视教师、职员文化研究和建设大学文化

大学组织中的群体可划分为三个基本类型,即教师(含学术研究人员)、职员(含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和学生。三大群体在大学组织文化中各有不同的文化表征,在组织体系中,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这直接影响着大学的文化建设。

第一,教师的文化选择与冲突,体现了群体间价值的选择与冲突及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弱化了大学文化建设的效能。教师作为大学组织体系的核心,是大学文化的代表者、体现者和实践者,教师所表现的尊崇自我、崇尚自由以及个性化的教学方式等,是大学文化外在的表象特征。这一文化特征,很难得到人们完全一致的认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大学组织文化的本质;二是大学教师的职业特征;三是大学教师的利益诉求;四是大学教师的个人本性;五是大学教师的价值观。优秀的教师文化体现了生命存在的人在组织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具有人的文化模式特征的组织,把组织中的每一个体的存在和发展视为内部所有活动的出发点,组织本身及其结构是为人服务的”。所以,看重教师在大学组织体系中的文化地位和价值,引导大学教师合理的利益诉求,形成优秀的教师文化,培育大学教师健全的人格,注重大学教师的人格魅力建设等,对大学文化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要重视对职员文化的研究和建设。在现有的

研究中,关于大学职员文化研究的理论文章很少,研究的理论深度也不够,但不能因此否认职员这个文化群体的存在及其影响力。相反,在大学中处于从属地位的职员群体,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认为,职员文化是大学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忽视职员文化建设,不仅不能体现大学文化建设的全貌,甚至会削弱全局性大学文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影响大学文化的效力。职员群体直接面对教师和学生,其群体文化建设常常对大学文化建设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随着资深职员数量的增加,个人阅历的逐渐丰富,其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影响力呈上升趋势。因此,不应忽视职员群体对大学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影响。

四、误区之四:漠视大学代文化的存在研究和建设大学文化

第一,大学是青年学子和教师、职员的聚集之地,大学文化的建构实质上是两代人之间文化的融合,这里必然存在两代人的对话、交流、协调、冲突、磋商等问题。教师代表主流文化,而处于青年期的大学生,具有新思想、新观念、新思维和多种流行的时尚元素,他们思维敏捷,感受力强,领悟力高,可塑性大,在社会转型期的多元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其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进而形成青年学子们特有的青年亚文化和校园亚文化,并与代表主流文化的教师、职员和既有规章制度之间产生摩擦和冲突。所以,如果不研究大学中的代文化,就不能全面了解大学文化,就不能很好地研究和建设大学文化。

第二,文化解释理论为我们研究大学中的代文化指明了方向。社会中占据文化阵地的主流文化可能会对青年亚文化形成认知性偏见,并且希望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来“拯救”和“改造”年青一代,但是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异质性,又导致了青年学生的心理不认同和文化抵抗,造成事实上的代际文化差异。要建立不同代人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一整套沟通机制,实现代文化间的整合,其核心是不同代人之间的价值整合。也就是说,要消除代沟,通过对以价值整合为主的代文化的整合,可以达到对青年学生教育的目的。对代文化的研究,有助于建构填平代沟的文化体系,弥补大学文化建设的不足。

第三,重视代文化建设,要求我们要关注大学的日常教学和管理中出现的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如“管理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所建立起来的各种行为规范往往难以被学生所认同,大学中许多已经相沿成习的规范因为缺乏内在的约束力而形同虚设,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作风严谨、严格要求学生的教师未必会受到学生的青

大学文化建设中的悖论与选择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 欧阳康

当前中国大学文化建设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大学领导者、教师和学生的关注,这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大学文化建设热潮的背后是中国文化建设的热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是否兴盛,是这个国家发展状态和发展阶段的一种反映。一个国家、民族非常贫穷的时候,不会太注意文化方面的发展,只有变得比较富强,有了一定的余力,包括有了富余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时候,才会去自觉地发展和建设文化。文化建设在近年来引起高度重视,还有另外一个突出的背景,就是当代中国大学面临着转型。转型期的大学有一种特别的现象,我把它叫做“围城”。我想从“大学的围城”谈起,谈谈对当前大学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一、转型期中国大学的困惑

相反,有宽容精神、学识渊博、思想活跃、不拘泥于刻板的教学、不拘泥于管理制度的教师和管理者,却更能为学生所接纳。无论是在政治信念、社会责任感、道德伦理、理想情操、友谊方面,还是在消费、婚恋、闲暇等生活方式的选择和态度方面,大学生们的一些表现即使不被视为出格,也常常会让他们的师长们多多少少地感到蹙额与不适”。

五、误区之五:忽视大学生亚文化群体在大学文化研究和建设中的作用

每一个复杂的社会都包含着许多亚文化,大学文化体系中同样也包含着许多亚文化。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学生亚文化及其对大学文化的影响。

第一,事实上,大学生会形成属于他们自己的亚文化。亚文化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与大学的科层制度有关,有的与学生们遇到的许多共同的生活、成长、学习等问题有关。通常情况下,每一所大学都有许多学生亚文化,这些亚文化的呈现形式与大学性质、特征及学生自身对其角色的认识有关。国外的研究表明,许多学生亚文化排斥成人价值观,而学生亚文化对其同伴群体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学校主流文化对学生的影响,起着导向、保护学生亚文化同伴群体的作用。美国社会学家科恩将学生亚文化划分为学术亚文化、娱乐亚文化和违规亚文化三类。从学生亚文化的分类可以看出,学生亚文化对大学文化既有正向的作用,也有

钱钟书先生在他的名著《围城》中描写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群留学归国的学子所感受到的中西方文化碰撞。这些碰撞,突出表现在他们的婚姻、家庭、爱情中。钱先生把婚姻比喻成一座城堡,城外的人想进城,城里的人想出城。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也做过“文化围城”的演讲,近年来我重点关注“大学围城”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大学是人们非常向往的地方,尤其是对家长和年轻的学子而言,可以说是寄托最高理想的地方。但是,大学内外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悖反现象。比如说,我们一方面看到千百万的学子通过高考,力图进入大学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已经进入大学的人中,却又不断产生各种意外,甚至令人悲痛的现象;学风不良、考试作弊,以至于无端放

反向的作用。如违规亚文化群体成员,主要由排斥主流社会价值、违反社会习俗的学生构成,他们普遍具有盲目的反叛态度。虽然他们强烈地反对学校的规则,会经常性地违反学校的制度,甚至做出恶意的破坏行为等,但是,违规亚文化群体成员对其亚文化群体中的规则却能够严格遵守。

第二,要格外关注反学校文化。大学中的反学校文化其实也是一种校园亚文化,其危害性较大。大学文化建设要高度重视反学校文化的影响力。著名教育社会学家张人杰教授在他的《学校文化与反学校文化》一文中指出,反学校文化是对学校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异化,它的三种表现是背离、对抗和挑战。英国教育社会学家戴维指出,学校中存在着“反学校文化”现象。教育社会学家马和民认为,社会文化会对学校文化形成巨大的冲击,学校文化事实上会被社会文化所替代。反学校文化的存在表明了学校理想文化和学校真实文化的差异,说明学校的真实文化背离了理想文化,使部分学生形成了与学校相对抗、相冲突的反学校文化,具体表现为不遵守学校规定、破坏学校秩序、无视教师权威等。大学文化建设中要给予学生亚文化尤其是反学校文化以充分的关注,应对不良的学生亚文化给予积极引导,校正、分化和瓦解反学校文化,支持、弘扬和建设优秀的学生亚文化。

来源:教育探索,2010年10期

弃自己生命的大学生比以前增多。这种入城的强烈愿望与出城的随意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就大学的教师而言,今天已经回归到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神圣地位。但是,今天大学围城内的一些教师却做着与自己身份很不相称的事情。有一些极端的例子:如剽窃、抄袭、到社会上去寻求自己的利益,等等。目前社会上有人批评说,商人穿着西装革履,越来越像教授,教授则油头滑脑,越来越像商人。第三个方面的现象是,大学本来应该是学术至上的地方,但是行政的权利却越来越大,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一方面我们希望大学能保持一方净土,以学术自由作为自己最高的宗旨;而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大学地位,又不得不向行政体系靠拢,以提高大学的级别。以上现象向我们表明,今天的大学正处在一个艰难、复杂的转型期。

二、中国大学文化建设面临的困难

从大学文化的角度,有那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正视,我想在此讲几个带有悖论性的价值取向问题。

1. 大学的保守性与创新性之间的矛盾

现在人们谈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大学的创新,但是大学的核心使命是教书育人,意味着用已有的知识教出符合现行规则的人。衡量一所学校培养的学生是否合格,一定是用既存的社会标准。现在我们国家的育人标准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这种要求是社会文化遗产的需要,意味着要用已有的知识体系来武装新一代人,而且要让大学生能够走进现代社会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中。如果我们培养的人是与这种知识体系、道德体系、行为体系相背离的,就不能认为自己的教育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同时又希望大学是开放的、创新的,这一点赋予了大学更加复杂的使命。一方面我们希望大学能够传承知识,另一方面又希望大学去批判、去变革、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大学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反思,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教出既符合规范,又能进行批判、变革、创新的人才,这对大学的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大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的矛盾

所有的大学都归属于一定的民族,至今为止还没有一所大学超越了民族、国界。也就是说,在文化的传承性上,所有的大学都承载着一定的民族使命。中国的大学一定和中国的文化相关联,与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关联,这样我们就有了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规定性,也是中华民族的大学特有的规定性。但是,我们又要求中国大学走向世界,要进入世界知名大学的排行榜。虽然中国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还有

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它已经被确立为中国大学的奋斗目标,211、985工程建设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这一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大学在中国文化传承与世界文化交融中的使命,对大学人来说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一方面要通晓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他也能够顺应世界潮流,这一点非常值得深入探讨。学生工作,中国叫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国外叫做学生事务。我在学校分管学生工作的时候就想,能不能与国际接轨,并做了一些尝试。通过实践,我们发现是能够接轨的。去年,在我们学校召开了欧太地区学生事务协会的第11届年会。通过这个会议,展示了中国大学在学生教育与管理中的许多优长。我现在是这个协会的主席。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学生事务的国际化与中国大学的国际化,以及与传承中国文化之间是可以达成一致的,但是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

3. 大学的神圣性与世俗性之间的矛盾

大学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人类文化的高端。前些时间,围绕我新近出版的《大学·文化·人生》一书,《中国青年报》对我做了一个采访,题目是《重建大学精神,没有固定模式》,希望我谈谈想了解我怎样看大学的发展。我说,大学本来就是人类文化走向崇高、走向神圣的产物。它是人类知识体系变得丰富、学科化后,而原有的、自发的教育形式不能满足需要而产生的。后来由于市民社会的形成,引起了社会宗教、社会教育体系、社会文化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现代大学。大学在发展过程中被看成是一种阳春白雪、一种象牙塔,起着引领文化的作用。但是,大学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又不断突破象牙塔,走进社会,走进世俗。大学走进世俗的过程,实际上是与大学走进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当大学走进市场就面临着两种力量的抗争:一种力量是学术的力量,高端文化和神圣文化的力量;一种力量是世俗的力量,经济的、无形的手的力量。而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大学中也已变得格外突出。今天的大学毕业生要面向市场各自去找工作,这对大学的专业设置、办学模式、教师身份等,都提出了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的力量、经济的力量与学术、神圣的力量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与反差,对大学管理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4. 大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关系

在整个西方现代大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基础就是现代科学体系。应该说如果没有现代科学,就没有现代大学,因此传承科学就是大学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对科学的定义过去是非常狭隘的,仅指自然科学、工

程技术。现在科学的内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不仅仅只有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也有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这一过程中, 大学的使命再一次受到挑战。从发生学上说, 大学产生于神学, 这就表明了大学的人文性, 也就是说大学使命本来是人文的, 但是在科学的影响下要走向科学体系。科学与人文在现代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分化, 形成了两种文化, 这就是斯诺先生所说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野。对中国大学来说就更是面临着尴尬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 长期以来重人文而轻科学。但是, 在近代中国特别是现代中国,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要求下, 大学更多地接受了科学, 甚至走上了忽视了人文的道路。这一点对中国的大学来说, 应该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科学与人文的挣扎过程中又渗透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大学模式的构建在 1952 年以后受到了前苏联模式的影响。1952 年的院系调整, 原则上是按照苏联模式构建的, 实际上就是对文、理、工、农、医、政、经、管、法、教等学科门类进行严格地分工, 这是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当时的做法是: 把北京大学进行解体, 把工科拿出来, 剩下了文科和理科; 然后把清华大学解体, 只留下工科, 把文科和理科拿走了; 同时在全国建立了一大批工学院、农学院、商学院、政法学院、财经学院。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大学, 本身就违背了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性。而现在要走向协调, 就需要克服这种模式对中国大学的影响。

中国的大学要在科技与人文之间进行协调, 这既是对教育体系的调整, 又是对科技与人文关系的特殊调试。在这一过程中, 有的学校调试得比较好, 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比如华中工学院, 就是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 它当年也是一所工科性学校, 但是得益于几位前辈的努力, 超越了人文与科学的隔离, 较好地走向了综合化。当年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院长, 在文革后不久就提出学校要走多科化的发展道路, 创建了文科、理科, 使我们学校在学科建设上获得了革命性的突破, 并招来了一大批学者, 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后来的杨叔子校长, 倡导理工科大学要加强文化素质教育, 到现在为止文化素质教育仍然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一面旗帜, 坚持十几年了。现在, 他老先生仍然是全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后来, 周济校长又强调产、学、研三结合, 强化了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通过 2000 年的四校合并, 我们学校有了强大的工科、医科、管理学科, 逐步发展了高水平和有特色的理科与文科, 但是要成

为比较完备的综合性大学还要假以时日。华中科技大学的发展, 是中国大学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也映射了当代中国大学面临的普遍困惑。如果大学不能在科学与人文之间保持一个恰当的张力, 就很难成为一所真正的大学, 因为健全的人是既需要科学, 也需要人文的。

5. 大学的大众化与精英性之间的矛盾

大学教育应当是一种精英教育, 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所有国家的教育体系中, 大学是国家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 包括了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生的培养。高端的精英教育, 承载着人类文明发展中高端文化的特殊要求。大学对此责无旁贷, 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够取代它, 包括其他研究机构。这种职责意味着大学对人类文明不断向高端提升具有重要的使命, 但是大学又在逐渐走向大众化。现在有一种非常通行的说法, 中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我觉得这种说法还值得探讨。首先, 过去我们的大学是否真正做到了精英教育? 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如果仅仅是从入学率很低, 师生比也比较低来看也许可以这样说, 但如果要从教育模式和教育水平的角度来看则很难说。近年来由于高校扩招, 我国高校的毛入学率有很大提高, 于是人们便说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的时代。我们关心的是, 大众化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如何保持自己的应有质量。我们担心的是, 大众化成为了降低或忽略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口实。应当看到, 即便在今天, 高考对于适龄青年来说, 仍然是一件非常稀有的和短缺的事情。相对于中国对于高层次优秀人才的需求来说, 高等教育仍然是一个非常短缺的资源。我们的责任之一是运用好这些资源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分层的情况下, 应当重新考虑不同层次和类别的高等教育的系统定位问题, 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 尤其是进入了 211 和 985 工程的大学, 应当继续保持大学教育的精英品格。华中科技大学提出了“一流本科、一流教学”的本科教育定位, 一度也有人不甚理解, 认为研究型大学应该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 通过这些时间的探讨与实践, 大家形成了共识, 那就是要继续抓好作为高等教育基础的本科教育。

6. 大学的公益性与投资性之间的矛盾

大学教育如果致力于人类文明的高端传承与人才培养, 它应当是一项以社会文化传承为使命的公益事业, 执行的是国家和社会使命。为此大学应该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是现在情况多少有所变化。过去上大学不要钱, 现在大学生要交学费, 高等教育投资结构的

变化,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高等教育如果全部由国家投资,那么高校就应当也有可能全心全意地执行国家的意志,责无旁贷地要履行国家、社会、人民赋予的使命。而现在的问题是,大学生由于交付学费而都变成了投资者,不管投资的份额有多大,他们都有权力来要求自己的投资得到期望的回报。大学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一种投资平台。这种变化对大学的性质和大学办学的管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当我们看到大学生就业难的时候,大家都很着急,因为大学生交学费也可以说就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投资,如果这种投资得不到及时的和相应的回报,不仅会带来他们自己的问题。也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这种投资还带来了大学生在学校地位的变化。他们不再仅仅是受教育者,而且是部分办学资源的提供者,从而有资格成为教育资源的主动索取者。大学生可以认为,我既然投资了,学校就应该为我提供相应的优质教育资源。从这种意义上讲,今天的大学生应当有权力参与学校的管理,也包括有权力对大学的事务发表自己的见地,尤其是提出自己对大学应有状态的设想,因为这是他们作为投资者的权力。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还包括家长、社会、企业,尤其是民办学校、二级学院等,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大学的公益性与投资者利益回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直接影响到大学的培养模式,也影响到大学的管理体系。

7. 大学的规范性与个体性之间的矛盾

大学教育从来就是要规范性地培养人才,要通过规范化的课程体系、培养模式和规范化的校园生活方式来使学生成才,这是它的一个基本要求。而且培养的人才还要达到统一的基本规格要求,如果达不到这一规格,就不能走出大学校园。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对学士、硕士、博士论文进行严格地审查的原因。规范性是规模化人才培养的要求,但是我们又希望大学生能够得到各具特色、自由、全面地发展。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未来的社会应当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这一理论落实在大学生的教育中,就是要让每一个大学生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或者说在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凸显自己的个性。大学在规范化教育方面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当前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特殊性和个性化发展上。

我在对学生工作提出过一个看法,学生工作应该分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解决绝大多数学生按照规范化方式成人、成才的问题。他

们甚至不需要跟辅导员、校方单独接触,只要按照这个规则安排自己的生活就能顺利地毕业,四年学习中他们应当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援助。但是另外两种人,我们要特别关注。一种人是有困难的人,包括经济、学习、心理上面临的困难。一种是具有优秀潜质的人。人们说大学生还会有学习上的困难?实际上,从中学到大学的教学与学习方式转换使一些大学生面临很大的困难。而80后的一代,在成人、成才问题上,心理问题非常突出。对80后我有一个看法,我们绝对不能简单地讲80后是有希望或无希望的一代。我们应该看到在一个多变的、复杂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80后和90后,他们的每一个优点背后也许渗透着他们的缺点,但是他们的每一个缺点同时又包含着可塑性和发展的空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价值观处于迅速的转型之中,一些主流价值还没有建立起来,又不断地被转化了。在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中,大学生们多多少少会变得无所适从。从受教育者来看,中国的独生子女制度对中国的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对独生子女的教育却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因为孩子真正的成长不仅需要与父母辈的交往,更需要与同伴、兄弟姐妹的互动与互助。我国实行独生子女制度已有近30年的历史,却没有形成一个社会性的独生子女教育体系,仍然让独生子女在相对孤独的家庭环境中自发地成长。在孤独中成长起来的人一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只会以自我为中心来考虑与世界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你要让他去理解社会,并承担责任是非常困难的。由于历史感的匮乏,家庭对他们的溺爱,缺少对自己和社会承担责任的意识和锻炼,独生子女的依赖性成长环境,当代不少大学生具有不自觉的自我中心化思维方式和行动特点等。当他们进入大学以后,要完全承担自我发展责任的时候,他们感到力不从心,但是这一切都成为他们的可塑的前提。80后、90后的大学生最具有可塑性,其前景就在于如何去进行塑造。

个性化的教育对大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需要有个性的老师,而这一点对大学教师是非常之难。我认为,大学教师的资格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因为你是博士、博士后留校,或者当了教授就可以一直当下去,三年、五年就需要一次调试、更新,因为中国社会变化太快,速度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大家都知道,我们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现代化几百年的历程。我们中国今天说面临的问题既有前现代的问题、现代性的问题,也有后现代的问题,这些问题交

织着,并在大学里突出地表现出来。对如何在规范中保留个性化发展的空间,是应该进行深刻反思的。

8. 大学教育中的灌输性与自育性之间的矛盾

我认为,所有的教育都要通过自育才能实现,而我们过去强调的是灌输性教育。在大学中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是没有问题的,但所有的教育都只有通过大学生自我的内在努力才能发挥作用。对80后、90后大学生来说,自我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工作中提出了一套学生工作思路,就是在全员育人的指导思想下,去推行全员自育,我觉得真正有效的就是自我教育。

比如,我发现一旦大学生走进了共和国的历史,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就会油然而生。我们的一些大学生为太原解放战争牺牲的74张没有发出的烈士阵亡通知书寻找亲人,在为“烈士寻亲”的活动中履行国家责任,在活生生的革命史教育中极大地增进了对于共和国的了解和感情。我们一些大学生自动地开展“衣援西部”活动,在同学和教师中募捐了十万件衣服,送到了四川凉山彝族家庭,在那里感受到了中国东西部发展的巨大差异,增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再比如说,关于当代大学生的公德意识问题,余秋雨先生有一次到我们学校演讲,谈到中国文化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公民社会形成很晚,公共意识缺乏,而公德意识更是匮乏。我对他说,您说的这一点与我们现在所做的一项活动暗合。我们搞了一个“公德长征”,专门管那些社会角色意识不够清晰时的人的行为。比如说:作为一位教师们知道应该怎样行为,作为一个学生人们能按照自己的身份来行动。但是,当他走上马路,走进公园,走上公共汽车、飞机、轮船的时候,身份意识就淡漠了,也不太知道该怎么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了。一些领导干部一不随意则大闹公共场所的行为,说明他们的公共意识、公共德性也是缺乏的。如果说80后、90后这一代人身上有什么问题,不是他们的错,而是社会赋予他们的,而这些问题的改正,要通过他们自我教育、自我学习来实现。而自我教育对中国教育体系提出了挑战,因为我们设计的教育体系是从上到下、从外到里进行灌输,教师也习惯于灌输式的教学方式。真正让学生学会自我教育,意味着教师要善于放弃,善于妥协,善于引导,善于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一点对大学教师来说是需要一个全面的再教育的过程。

今天的大学还面临其他一些悖论性问题,这些悖论实际上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有这些悖论是完全正常的,因为教育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事业。我有一个

基本的看法,随着现代科学由简单性走向复杂性,大学管理者也要适应这种变化,也要学会用复杂性的方式来看待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和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如果简单地用大而化之的方法来看待今天的中国,一定会出问题。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走向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走向高风险社会的过程。教育是一项相对稳定的事业,但是它要培养的人是要去应对社会风险的人,这就对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大学的文化建设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究。但是我并不悲观,这些悖论并不一定就能阻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围城”内外的选择

面对以上问题,我们应该做那些基础性的决策呢,或者说如何进行价值选择呢?

1. 大学教育仍然要定位于高端文化

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但应该是其中最积极、最活跃、最带有创造性的文化。这样大学文化才能够引领科学文化,引领人文文化,引领人类文化、引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这种意义上,大学管理者、大学的教师应该有这样一种责任感:在人类文化的分层次发展中,我们一定要始终立足于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走到发展的前沿,能够不断探询未来发展的方向,而且通过大学的实践,让它们得到实现和传播,并在对人的培养中获得更新与发展。

2. 要着力守护大学的精神

办大学就是办一种氛围,办大学就是办一种精神。涂又光教授当年讲过,办大学就是办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就像一个泡菜坛子。泡菜坛子里的水是什么味,泡出来的菜就是什么味,这是一个再形象不过的比喻。西方也有一种理论认为,大学就像熔炉,用什么去熔炼和塑造大学生呢,核心就是大学的精神。对大学精神的探讨和塑造,应该成为当代中国大学尤其值得关注的的事情。重塑大学精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要追求一个统一的模式、统一的标准。每一所学校有自身历史的、文化的传承,当然也要融入中华文化、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向,同时要体现自身的特色。中国大学发展到今天,最悲哀的事情就是千校一面、千校一体。但是要真正创造出各具特色的大学精神,使中国的大学精神变得更加丰富,对所有的大学管理者都是的一个考验。

3. 要激励卓越追寻

我始终认为美德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大学在传承美德与卓越中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机构不能替代的。卓越精神在今天看来,应该包括很多的要素,包

构建大学文化要基于历史使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 杜玉波

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必须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从战略层面,自觉地将其纳入到国家文化建设的大格局中,纳入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视野。为此,针对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的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建立大学文化的研究和推进制度

建立大学文化的学术研究和推进制度,我认为要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开辟大学文化学这个新的学科方向,即是参照国内外文化研究理论成果,在高等教育学中引入文化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从新的视角来审视大学的本质、职能和发展机制,形成独立的学科方向;二是每所大学都应结合学校实际,建设文化发展研究的专门队伍;三是注重研究方法,即要坚持人文的、思辨的宏观方法,同时又不忽视科学的、实证的中、微观方法,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的个性与特色研究,推进文化建设理论转化为文化实践活动。

健全大学文化建设的领导制度

大学文化,是全体大学人共同创造的结果,特色大学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对文化建设意识与方向的引导。建立和健全大学文化建设的领导制度,重点是要树立文化建设的导向制度和推动制度。加强领导制度建设,必然离不开大学领导者,包括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同时包括特质文化的积极推行者和力行倡导者,比如教授、院长、系主任和职能部门负责人等,也包

含了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等,在这里我重点谈三个方面。

第一,培养爱心。我觉得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不爱家长的人,很难去爱国家、社会、民族、人类,而这一点已经成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爱心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础,只有有了爱心,才能使大学生与他人和社会真正地融合起来。

第二,培养责任。当代大学生比较缺乏的就是对自己负责,以及在对自己负责基础上的对家庭、对社会的负责。不能想象一个对自己都不负责任的人,能够对国家、社会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责任体系非常重要。

第三,诚信教育。诚信是人之为一个基础,现在变成了一种美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悲哀,

括普通师生。

大学领导对文化建设的推动,主要表现为思想观念和发展方向上的领导。目前,社会、政治、经济和知识传播的手段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大学文化的变革和发展也是时代变革的必然结果。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范畴,它必然受到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同时也受到传统文化、制度文化、外来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大学领导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比如,如何深刻地认识大学的历史使命,如何深刻地认识大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如何确定大学的发展目标等等。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正确把握大学文化发展的方向,制定符合每一所大学的“文化建设长远规划”,才不至于造成大学文化发展的迷失。

完善大学文化建设的统筹制度

统筹制度是大学文化建设资源科学分配的一系列规则,是大学文化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就是要做好校风学风、教学科研、社会实践、课外文体、校园环境等文化建设内容的资源安排,保证大学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协调发展。

统筹制度的建立,要克服业已存在的文化建设占用大学核心资源的思想,克服文化建设脱离中心工作的思想,克服文化建设就是唱唱跳跳、开展活动、休闲娱乐的思想,克服文化建设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思想,把文化建设作为新时期大学和谐发展的要求,

但也是一种必要。今天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博士生,如果通过多年的学习不是学会如何学习,而是学会了抄袭、剽窃,那比不上大学还糟糕,因为你整个学的就不是人类文明之道。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谬误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今天,诚信成了基础性的学风建设。

第四,真善美的追求。今天大学精神的真正价值,还在于帮助大学生们去求真、求善、求美。真、善、美是人类的最高追求,也是一种基础性追求。如果要对人的本性做一个规定,我就把他规定为,人是能够追求和创造理想世界的动物。而在这种追求中,真、善、美是永恒的价值,对它的追寻是要有代价的,是需要整个人类付出努力的,而大学更应该如此。

来源: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05期

大学文化不可或缺“四性”

徐显明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撰文认为:我们在办成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以前,要先办成受人尊重的大学。受人尊重的大学在于它的文化性。大学是知识的共同体、学术的共同体,更是文化的共同体,大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文化存在,只有文化存在,大学才会被人尊重。受人尊重的大学文化不可缺少的有四性:

(1) 大学的德性。大学的德性决定了大学文化的品质,大学文化的质量是靠大学的德行(性)衡量的。我们要办社会需要的大学,更要办对经济社会发展起支撑作用的大学,最后再办有民族代表性的大学,这就是大学承担使命时所

作的选择。

(2) 大学的思想性。思想是大学文化的高度,大学道德是大学文化的质量。有思想的大学才是有文化的大学。没有思想的大学一定不是好大学,它没有资格做社会的灯塔,因为社会的灯塔是用思想点亮的。

(3) 大学的创新性。创新性是大学文化的力度。能创新文化,大学的生命力就强。

(4) 大学的特色性。只有特色性,才能表明文化的个性。个性到什么程度?个性到不能被别人模仿、不能被别人照搬,只有你才是唯一的、第一的。这种个性和特色性,是大学文化区别于其他大学的根本所在。

大学精神: 和谐校园的深层内驱力

叶宗波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撰文认为,构建和谐校园,物质条件是客观基础,民主管理和规章制度是保障,大学文化是精神内驱,大学文化中的大学精神则称得上是深层内驱力。

(1) 大学精神是“黏合剂”。大学精神是一所学校的文化基因,它能够不断传承、代代相继,一旦成为师生员工的自觉意识,就能够为大学人提供精神归属和精神家园。它不仅影响在校师生,而且能影响学校几代人乃至整个学校的后继者和校友,成为凝聚、感召广大师生员工的精神力量。

(2) 大学精神是大学改革的“内燃机”。大学精神内化为大学人的学术良心和道德规范时,就会转化为道德的力量,推动大学人去探索知

.....
作为大学育人的新手段、新视野,作为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新内容。

统筹制度包括人员统筹、资金统筹等。人员统筹就是要调动所有大学人文化参与的积极性,明确文化建设的规划、组织、领导、执行、参与和责任。资金统筹,就是要保证文化建设的投入。虽然大学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的投入会附带产生文化成果,但不能因此忽视具有文化显性的载体系统直观、清晰的媒介作用。如校园景观、

识、追求真理。一方面为质疑、批判、否定和超越旧制度旧体制提供了锐利武器,另一方面又逐步将新制度新体制蕴含的价值观念制度化、规范化,从而使精神文化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3) 大学精神是大学稳定的“调控器”。精神信仰、价值观念、道德风尚、思想意识等因素对维系校园秩序具有特殊的功能,一旦这些因素受到冲击或控制力减弱,学校就会失去原有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就会失控、失范、失稳、失和。

(4) 大学精神是大学发展的“助推器”。只有当主体的思想认识达到一定的程度和水平,物质投入才具有内涵性的价值和意义,才会有创新成果出现。因此,大学精神对大学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力。

仪式化活动等都需要一定的资金保障。可借鉴企业文化发展的经验,设立面向社会、面向校友的文化发展基金,多渠道地获得文化建设的经费支持。

来源: 人民政协报, 2010年/5月/12日/第C02版